

本刊收录于马来西亚高教部期刊索引库 *MyJournal*

當代中國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吉隆坡 马来西亚

Kuala Lumpur Malaysia

Vol.11 No.2 October 2024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Volume 11, Number 2, October 2024

第 11 辑，第 2 期，2024 年 10 月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社长
饶兆斌

主编
潘碧丝

副主编
贺艳青 林德顺

编辑
李志良 薛海娜 娜仁图雅 朱鹏

英文编辑
张添财

编辑助理
张彦涵 胡宁

国际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江柏炜
台湾师范大学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苏晖
华中师范大学

杨雪冬
清华大学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

袁兴言
金门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黄子坚
马来亚大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airman

Ngeow Chow Bing

Chief Editor

Fan Pik Shy

Deputy Chief Editors

He Yanqing Ling Tek Soon

Editors

Lee Chee Leong Nur Shahadah binti Jamil
Naren Tuya Zhu Peng

English Editors

Peter Chang Thiam Chai

Editorial Assistants

Hu Ning Chong Sin Wah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Bo-Wei Chia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ih-Yu Shi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ui Zhiyuan
Tsinghua University

Danny Wong Tze Ken
Universiti Malaya

Nie Zhenzhao
Zhejiang University

Pan Hsiao-Hu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han Baoshu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Shen Zhi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ing-Yen Yuan
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

Su Hu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ang Haigu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Yang Xuedong
Tsinghua University

Zhou Jiansh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Volume 11, Number 2, October 2024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第11辑, 第2期, 2024年10月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14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The contents of a published articl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author or authors and not that of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or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Cover Title: Dr. Lee Kean Yau

Typesetting: Wong Yee Chen

Printed by Universiti Malaya Press

Universiti Malaya,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Please visit the CCS homepage at

<https://icsum.org.my/contemporary-china-studies-ccs/>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 fully peer 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 indexed in MyJurnal, Citation and Infometric Divis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with focus on subject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ical, cultural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 79567288

Fax: +(603) 79674438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Further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and acquisition, subscription and other enquiries could also be sent to: Miss Susie Ling, CCS Editorial Manager (E-mail: susielyp@um.edu.my)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 经典的问题与问题的经典： 001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下） / 孙玉杰
Classic Questions and Classic Answers: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Part Two) / Sun Yujie
- 旧阵时：香港散文的文化记忆与地志写作 / 钟怡雯 025
In the Old Days: Cultural Memory and Topographical Writing
in Hong Kong Prose / Choong Yee Voon
- 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进路——以中国与马来西亚 041
为例 / 邢晶、何启才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The Case of China and Malaysia
/ Xing Jing, Ho Kee Chye
- 李碧华小说九七前的焦虑书写 / 林淑娴、蔡晓玲 061
The pre-1997 “Anxiety-filled” Writing in Li Bihua’s Novels
/ Lim Sok Yin, Chai Siaw Ling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 语言习得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基于
马来西亚吉隆坡和中国南京样本的跨文化研究
/ 卢海宁、邓铸、庄瑜璐 079
-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on Styles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
Cross-Cultural Study Based on Samples from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Nanjing, China / Loh Hai Ning, Deng Zhu,
Zhuang Yulu
-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新媒体运营 103
——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 / 米芮仪、董希平
-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useu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 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 Mi Ruiyi, Dong Xiping

经典的问题与问题的经典：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下）

孙玉杰

摘要：陈永发研究员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中共历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先后出版两个版本，多次印刷，在学术界产生重大的影响。2001年的修订版是1998年初版基础上，参考高华、杨奎松和齐锡生三位教授的书评进行的修订版，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就五大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期待促进中共党史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陈永发；书评

作者：孙玉杰，淮北理工学院教师、安徽大学陈独秀研究中心、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邮箱：sdj602@126.com

Title: Classic Questions and Classic Answers: A Review of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Part Two)

Abstract: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uthored by Researcher Chen Yongfa, is a classic work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t has been published in two versions and has undergone multiple printings, mak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 revised edition from 2001 builds on the original 1998 version, incorporating insights from book reviews by Professors Gao Hua, Yang Kuisong, and Qi Xisheng. However, it still presents several issues. This article engages with five major problems and discusses them with Researcher Chen, with the hope of advancing the study of CCP history.

Keywords: Sevent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Chen Yongfa; review

Author: Sun Yujie, a lecturer at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er at the Chen Duxiu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rea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mail: sdj602@126.com.

(三) 史实问题

历史学的最大价值是追求真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给人类启发，同时，求真、求实也是史学著作的最高目标之一，“史实”错误是历史著作的最大“硬伤”。陈著 1998 年初版中的“硬伤”，在高教授、杨教授与齐博士书评已经指出，在 2001 年修订版，陈著作进一步修改，但是，2001 年修订版中，仍然存在诸多“硬伤”，此乃史家之大忌，在修订版着实不应该再出现。

1. 第 2 页，“1989 年苏联解体以后”；第 5 页，“到了 1980 年代底，苏联分崩离析，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也相继风云变色”；第 956 页，“1991 年 8 月，共产主义的祖国——苏联——也从地图上永远地消失”，这些表述都是错误的，属于“硬伤”。因为苏联是 1991 年 12 月 25 日解体的，“苏联于 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1991 年 12 月 25 日停止存在”¹，“1991 年 12 月 25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随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政治改革的影响下，先于苏联解体前，相继发生剧变³，已经是基本的历史常识知识。

2. 第 10 页，“1978 年邓小平开始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他是带着历史包袱来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不可否认，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和在肇始阶段的作用，但是，讲“1978 年邓小平开始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太符合历史的史实，忽视了华国锋在改革开放起始阶段的历史功劳，“中南互访对后来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⁴，“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

1 (俄) 鲁·格·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第 798 页。

2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年，第 465 页。

3 (英) 本·福凯斯著、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1998 年，第 249-282 页。

4 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

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起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⁵。陈著的此论断中，如果不带“开始”两个字，则不存在历史史实的质疑。

3. 第 18 页，“毛泽东认为提倡四大自由，是提倡‘大民主’，并讽刺西方议会式民主是‘小民主’”。在毛泽东心目中“大民主”与“小民主”概念有个时空转换问题，不能笼统说此观点。在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时，毛泽东就反对“大民主”，为此还把提倡“大民主”概念的李慎之，划为右派分子，形成一段公案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又提倡四大自由，认为是“大民主”⁷。

4. 第 26 页，“1957 年大鸣大放，便有民主人士批评中共是小知识分子党。毛泽东听后勃然大怒，但承认中共是小知识分子的党，要求党员以事实证明小知识分子也会治国”。这里提到的民主人士是罗隆基，罗批评中共是“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⁸，而不是批评中共是“小知识分子党”，更无毛泽东承认中共是小知识分子的党的说法。

5. 第 35 页，“他（指毛泽东）在 1940 年代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⁹，在 1007 页，陈著也表达为“1938 年底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前后叙述也发生矛盾。

6. 第 52 页，“到八年抗战结束之时，国民党疲惫至极”。陈著“八年抗战”说，其实，关于抗战的起止时间，多有争论，陈著

春秋》，2008 年第 8 期，第 8-10 页。

5 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续）》，《炎黄春秋》，2011 年第 3 期，第 9-17 页。

6 李慎之：《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的一段公案》，《百年潮》，1997 年第 5 期，第 46-51 页。

7 萧克、李锐、龚育之：《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国翻译出版社，1998 年，第 1-14 页；李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兴起、入宪与废除》，《兰州学刊》，2006 年第 12 期，第 45-48 转 128 页。

8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87 页。

9 许兴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新文化运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26 页；李君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37 页。

中，也应该表达出来。1978年，辽宁地区文史专家，就已经提到“十四年抗战”的主张¹⁰，学术界公开表达“十四年抗战”的文章和著作，也出现较早，1988年，就已经公开出版带有“十四年抗战”的著作《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史论文集》中，有多篇论文标题出现“十四年抗战”字样¹¹；王秀英于1999年，发表《论十四年抗战》，“本文的观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九三’光复，整整14个春秋”¹²。

7. 第69页，“从1917年11月到1919年5月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成立的时间是1919年3月2日-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¹³，“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两天后改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正式成立”¹⁴。

8. 第87页，正文和注释23补充内容中引用黎永泰的《毛泽东与大革命》著作中都提到毛泽东读过的一本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主义宣言》，其实应该是《共产党宣言》，在黎书中也是《共产党宣言》¹⁵，在中共党史上最著名的一本书，在陈著却写成为《共产主义宣言》明显是错误的。

9. 第106页，图片介绍周恩来的情况时，说“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查《周恩来年谱》未见留学英国的记载¹⁶，而且杨奎松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其实未去过英国”¹⁷，应该在2001年

10 陈凤军：《“十四年抗战”1978年由辽宁专家提出》，《人民网》，2017年01月17日，查阅2023年05月27日（此文章，在这里仅仅提供一个信息，陈著作作时，不可能知道此种情况）。

11 潘喜廷主编：《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史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12 王秀英：《论十四年抗战》，《沈阳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20-23页。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6-76页。

14 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5 黎永泰：《毛泽东与大革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26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25-29页。

17 《杨书评》，第176-177页。

修订版中，修订过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还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10. 第 228 页注释 1 中，问题是一，该注释没有史料来源；二，向忠发的职务表述不正确，“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会兼中央主席”，第 231 页的表述也不一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主席”。而向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¹⁸；“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¹⁹。

11. 第 240 页，“1930 年春他（指李立三）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应该是 5 月 20 日，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不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次会议上，作出 1930 年 11 月 7 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实现这一计划，区域代表大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少共中央等九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委会，领导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²⁰。

12. 第 291 页，注释 18，“彻除他（毛泽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观点，是 1998 年初版 278 页注释 17 中的论点之一，“彻除他（毛泽东）政治局委员和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此论断的问题：一，撤销“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高华教授在书评中，提出质疑并指出，“在 1931-34 年的几年中，毛一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撤销其政治局委员一职，这并非事实”²¹。2001 年修订版为回应高教授书评的质疑，删去“撤销政治局委员”，保留“彻除他（毛泽东）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二，毛泽东的职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²²，不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从 1931 年 11 月 27 日，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到 1934 年 2

1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76 页。

19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 82 页；曹润芳、潘贤英：《中国共产党机关发展史》，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109 页。

20 唐志红、谭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年，第 236 页。

21 《高书评》，第 117 页。

22 王平：《王平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年，第 36 页。

月3日，苏二大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²³。

13. 第304页，注释3中，存在的问题：一，著作中要引用的内容，在王健英的著作并没有呈现出来；二，引用王健英著作注释后面的内容，史料来源何处？三，红八军团长是周昆²⁴，“无论如何，军团长周子昆为此遭受军法审判，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由毛泽东下令除绑释放”，此处表述，按照上下行文逻辑看，周子昆，应该是因红八军团的问题，受到审判，可是问题是周子昆是因三十四师的问题，“当时有两个部队。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一个是周子昆当师长的三十四师。由于部队中大多数是新编入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打散拖垮了”²⁵；“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李德要周子昆率教导团（由红二十二师缩编而成）正面强攻黄平。……专断骄横的李德指责周子昆抗拒军令，有意把部队搞跨，叫警卫队把他绑起来，送军法处审判”²⁶。红八军团是存在时间最短的红军部队，也牺牲最惨烈的部队之一，从组建时10922人，经过湘江战役，仅剩600余人，连挑夫，勤杂人员等加起来，也不过1000人²⁷。显然，陈著中，结果是周子昆，起因却是周昆的原因，应该是把周昆的因与周子昆的果搞错了。

14. 在311页，“他（王明）在苏共中央的指导下，于1935年8月1日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发表在巴黎《救国报》上，高华教授在书评，已经指出此问题²⁸。8月1日发表是不符合历史事实，“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²⁹，不知道为何2001年修订版中，不进行修改。

23 唐志宏、谭继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稿》，第248-249、256页。

24 王健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简编（1927-1937）》，第336页。

25 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78页；《解放军烈士》编委会：《解放军烈士传》（七），北京：长征出版社，1993年，第417-418页。

26 《解放军烈士》编委会：《解放军烈士传》（七），第417-418页。

27 颜梅生：《红八军团：存在时间最短的红军部队》，《湘潮》，2011年第4期，第36-37页。

28 《高书评》，第117页。

2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7页。

15. 第 325 页，图片文字介绍中，“（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军队在八年中由 5 万扩大到至少 50 万人”，而在 331 页中，“当时中共的军队总数不过四万稍多”，两处的数据相差近 1 万人。在 326 页，“把大江南北的共军残余约 6000 人集合起来，另外成立新编第四军”；在 341 页，又说，“此时（1940 年底），八路军已从 4 万余人扩大到 50 万”。问题是，这些数据的史料来源何处？只要数据有史料来源，哪怕不符合历史事实，可以争论。1938 年 4 月，新四军全军已集中 10329 人，枪 6200 支³⁰；1937 年，八路军成立时，已有 80000 人，同时，325 页图片文字中还有两处表述不准确：一，“中共将其军队编组为”；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当时，国共合作时期，“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不能说成“中共将其军队编组为”，而且八路军的序列前后有变化，1937 年 8 月年为总指挥部，1937 年 11 月称为十八集团军，最高领导层前后称为总指挥和总司令³¹，人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不能搞混乱，叙述要符合历史当时的情景。

16. 第 357 页注释 10，参考文献引用刘昶教授的文章，陈著中，又添加发挥，比刘原文中，多“极少数的富裕农民”一段词语，“极少数的富裕农民”，不还是富农吗？与前面的“富农”是相同的意思，多此一举。最致命的是刘文的引文，已经对原著进行再加工，导致出现错误，陈著没有核对原文，使错误传递到陈著。刘原文应该引用的是“按照这个合理负担办法，负担户数占全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³²，到刘文中却成为“根据当时的统计，在实现统一累进税以前，根据地的税收主要落在占全部人口 30-40% 的富裕人口头上，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和富农”³³，由原著中的“全部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变成刘文中的“全部人口的百分之

30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9 页。

3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4 年，第 3-8 页；宋任穷：《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页。

32 财政科学研究所：《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第 239 页。

33 刘昶：《华北村庄与国家 1900-1949》，《二十一世纪》，1994 年 12 月号，第 49-62 页。

30-40%”。 “全部户数”与“全部人口”不是一个概念，当然，刘教授引用错误在前，陈著没有核对原始资料出处和具体内容，盲目引用，导致误引，引文要忠于原著，要核对无误，且不能偷换概念。

17. 第 472 页，“结果这一场被刘少奇目为经济上‘淮海战役’的改造资本家运动，又以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和平取得胜利”。这里“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社会主义改造是从 1953 年开始到 1956 年底基本完成³⁴；也与 623 页的叙述“1956 年全国私营，而到次年私营工厂则简直可以说是从中国绝迹了”不一致。

18. 第 484 页，正文和图片介绍文中，“当他（毛泽东）说到‘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时，许多在天安门前的群众都激动地热泪盈眶”。现在的历史事实已经非常清楚，此句话，不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仪式上的讲话，而是在新政协会议上的讲话³⁵。

19. 第 486 页，“在 1952 年发起三反运动”，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三反运动”，开始于 1951 年³⁶，也与 513 页图片上的叙述“1951 年 12 月中共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的三反运动”相矛盾。在陈著中，经常出现前后论述相矛盾的现象。

20. 第 491 页，“全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是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此处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政协会议不是立法机关，开国之初，暂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³⁷；492 页，图表中“政”下面，怎么会包括军事机构呢？

21. 第 501 页、891 页，“1952 年 8 月，毛泽东调邓小平到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第 502 页，“五个月后，他（指毛泽东）乘正式成立国务院的机会”；第 564 页，注释 22，“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富春”。此四处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不是“国务院”，而是“政务院”，1954 年第一届

3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77-287 页。

35 秦九凤：《知情人话误传：印证毛泽东在开国大典说的一句话》，《党史纵横》，1994 年第 5 期，第 6 页。

3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53 页。

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272 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改为“国务院”³⁸，同时，称为中共国务院也不符合中共历史的表述常识。

22. 第 509 页，“在城市或农村的社会基层，中共虽然暂时保留国民政府的保甲或其他类似制度”；510-511 页，“（1950 年代）当时最流行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高华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此两处的错误³⁹，不知道为什么，陈著在 2001 年修改版，还会出现此种现象，而且还不止一处。为回应高教授的书评中对保留“保甲制度”的批评，陈著在修改本中，增加一处引文，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可是，在引文的原著中 114 页，明确表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城市基层政权”，119 页，仅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长进行工作”，不等于保留保甲制度，仅是使用“保甲长”的工作关系⁴⁰；至于《霓虹灯下的哨兵》，创作于 1963 年是历史事实，陈著之所以在高教授指出错误后继续引用，原因与该剧本所反映的历史背景相关⁴¹，而且《霓虹灯下的哨兵》是话剧性质的文学作品，带有虚构的文学色彩，在历史学著作中，仅能够提供一个参考价值，不能当作历史史料使用，是陈著处理不当造成的结果。

23. 第 551 页，“1950 年 6 月，北韓大军南下，韩战爆发。中共虽然事先得到金日成的通知，但并未积极参与筹划，更不知道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时间表”。此处说“事先得到金日成的通知”，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事实是“已公布的史料表明：朝鲜内战爆发时，中共中央事先没有得到通报。尽管 5 月金日成来北京秘密访问时打了招呼但他并没有透露统一行动的具体时间。中国在平壤尚无外交人员对苏、朝方面的行动并不了解”⁴²。

24. 第 609 页，图片中的介绍文字中，“1954 年中共中央号召

38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年，第 10 页。

39 《高书评》，第 121 页、117 页。

40 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1945-19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第 114、119 页。

41 白文：《谈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戏剧报》，1963 年 01 月 31 日；袁成亮：《〈霓虹灯下的哨兵〉诞生记》，《党史文汇》，2005 年第 11 期，第 44-47 页。

42 刘统：《中共对朝鲜战争初期局势的预测与对策》，《党的文献》，2001 年第 6 期，第 52-57 页。

成立农业生产合作”。此论断，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抗战时期，山西革命老区农民就自发地成立一些劳动互助组”⁴³；1949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就已经规定实行农业合作社政策⁴⁴；1953年9月，正式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⁴⁵。

25. 第 617 页，“1952 年中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在农村经商致富的机会几乎断绝”。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是 1953 年，这里的 1952 年，明显不对，统购统销政策是“从 1953 年开始直到 1992 年底停止，共施行了 39 年”⁴⁶。

26. 第 639 页，“荣毅仁此时（五反运动时）是中共的国家副主席，因为毛泽东说了几句好话，所以其承认的赃款尽管是天文数字，也立即摇身一变，由基本守法户变成完全守法户”。此处的论断，有两处，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合，是历史事实错误，荣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是“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国家副主席”⁴⁷，而且，表述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也不恰当。当时，对资产阶级的处理分为五类，“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荣毅仁最终被定为“守法户”，而且陈著引文也有原著文章不尽一样的地方，在薄文中是“资本家接连跳楼自杀的现象，情况十分严重”⁴⁸，陈著中成为“资本家跳楼自杀的很多”，引文要忠于原文。

27. 第 692 页，“反右运动进行期中，仍然按原订计划进行党内整风”。此论断，在 1998 年初版中，高华教授曾提过质疑，并

43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党的文献》，2008 年第 5 期，第 71-74 页。

44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档汇编》（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年，第 7 页。

45 杨凤城：《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36 页。

46 杨继绳：《统购统销历史的回顾》，《炎黄春秋》，2008 年第 12 期，第 48-54 页。

47 《荣毅仁：从“红色资本家”到国家副主席》，《检察日报》，2005 年 10 月 31 日（8 版）；计泓庚：《荣毅仁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92 页。

48 薄一波：《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6 期，第 3-11 页。

举例证实自己的观点⁴⁹，高教授的质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历次整风运动，首推延安整风，陈研究员应该很清楚，写过专著《延安的阴影》。1957年的整风运动，“风”未整过多少，倒是整了不少人。但是，不能理解的是陈著在2001年修订版中，对此观点仍然保留，只是增加一个注释⁵⁰，即高华教授书评中举例的书籍⁵¹，解释的语言也基本是高华的语言体现。问题是，高教授就是利用戴的例子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或陈著中观点的不正确，但是，陈著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却引用戴著作反面的论证，而且不像690页注释⁵²，提到杨奎松教授的名字，此处连高华教授的名字也未提，此处应该是高教授的学术贡献。目的是稀释自己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陈著中的此论断是仍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不听从高华教授的良言而为，进行修订。

28. 第701页，“（莫斯科会议后）1958年年初，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此论断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关于毛泽东第二次莫斯科之行的时间，在1998年初版中469页，说是1958年，高华教授在书评中已经指出错误⁵¹，在2001年修订版中，陈著已经进行修改，但是，陈著篇幅过大，顾前不顾后，2001年修订版本，虽然把莫斯科会议去时的时间修改，但是，在701页，把回来的时间又搞错。毛泽东以及中共代表团是1957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⁵²。

29. 第708页，“八大二中会议轻易地通过了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707页最后一段的内容来看是介绍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召开的情况，叙述到708页却变成“八大二中会议”。这样的表述是错误的，在中共历史上，党的代表大会，只有中共八大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八大第二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而八大二中（一般称为“八届二中全会”，陈著中称为“八大二中会议”）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八大第二次会议不等于八大二中全会

49 《高书评》，第120页。

50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51 《高书评》，第117页。

52 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二），《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1期，第19-46页。

议，她们之间的差别大⁵³，也是中共党史上两次最易被人们混淆的党的会议⁵⁴，结果陈著中真搞混淆。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会议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而不是陈著中的八大二中会议⁵⁵。同时，该论断还有个表述不当之处是“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难道还有“旧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3年，中共提出的是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⁵⁶。

30. 第 877 页，图片介绍中，“1991 年 5 月，江青据传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另说在女儿家结束生命”。此论断，有两处不妥：一，“据传”，历史著作用语要严谨，不能用道听途说式的语言；二，“另说”的史料来源何处？在 1998 年初版 846 页中，陈著是这样叙述的“1991 年 5 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杨奎松对此论断，提出质疑，认为是“在女儿家（自杀身亡）”⁵⁷，陈著 2001 年修订版，为回应杨的质疑，改为现在的表述，结果是弄巧成拙。江青的自杀地方，用当时政府的通告，最权威，“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⁵⁸。这样的表述，不仅解决质疑问题，还符合历史的叙述，在监狱或者在女儿家都属于居住地。

31. 第 913-914 页，“1987 年 9 月，海南岛建省，这时全部一个省都可以变成经济特区”；图片文字介绍中，“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此两处的论断，明显是错误的：“1988 年 4 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0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投入兴建”⁵⁹。

32. 第 920 页，“1980 年底，中共闻放省人民代表的选举”，

53 吴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不等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历史学习》，2002 年第 4 期，第 16-17 页。

54 李美玲：《关于“八大二次会议”与“八届二中全会”——从一条注释的错误说起》，《中共党史研究》，2009 年第 7 期，第 126-127 页。

5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313 页；马齐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第 146 页。

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260 页。

57 《杨书评》，第 177 页。

58 （美）R·特里尔著、刘路新译：《江青全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62 页。

5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444、437 页。

此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1979年下半年开始，经过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的两次试点，1980年下半年，中共开放的是县级人代会代表的选举，而不是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⁶⁰。

（四）论点或观点问题

“论点或观点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只要观点中立，不偏不倚，不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保持某种独立的价值观，“History”中的“His”是男性“他（的）”，第三人称，即从第三方看历史的意思。如高教授所说，“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中，由认识的差异而引起歧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一般被视为观点和解释体系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但是有些情况则不属于这个范围”⁶¹。陈著有许多论点或观点，就属于此种情况，杨奎松教授也提出过质疑，“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⁶²，不是一部严肃史学著作应有的面貌。

1. 第4页，“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和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无论此观点对与否，或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论，但是，不符合中共党史的叙述模式，应该表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⁶³。

2. 第9页，“则中共的确已告别‘革命’”。注释1，仅提供一份史料证据，就能证明中共的确已告别“革命”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表面看是结束，但是，“革命”的思维和方式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看仅一所南京大学，从1978年以来发生的事件⁶⁴，可略见概貌，同时，还要知道李的告别“革命”论，受

60 阿计：《历史的选择：人大50年》（续篇一），《政府法制》，2004年第9期（上），第14-21转31页；白益华：《全国第一届县级直接选举工作始末》（上下），《中国人大》，2004年11月25日、12月10日，第40-43页、50-53页。

61 《高书评》，第119页。

62 《杨书评》，第186页。

63 李曙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是怎样提出和确定的》，《青大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1-8页。

64 “从1978年到1991年，仅在南京大学就发生过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当局的严厉查处和批评，但结果却是令官方难堪的”。熊黎明、徐晓：《史家高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页。（此书出版于2012年，超出本书评的论证时间范围，但是，“五次重大思想事

到多么强烈的反击⁶⁵，一直到现在，“无法告别革命”⁶⁶。

3. 第10页，“他们有时反而比毛泽东更‘左’，而在进行党内斗争时，为了避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指责，……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德怀是等而上之者，他们尚且不免有这种问题，等而下之者就不堪闻问了”。此观点的问题：一，史料来源即证据是什么？二，高教授书评中，也提出过质疑⁶⁷。不知道，陈著为什么还坚持此观点？坚持此观点，也没有错误，因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可有自己的论点或观点，问题是仍然缺乏史料的支撑，最关键也是与陈著中后面的相关论述也不一致。特别是说“彭德怀等而上之”，更与历史事实不尽相符合，陈著中此观点涉彭，应该是指彭德怀与袁文才、王佐案和1958年军中“教条主义”案。在256页图片介绍文字中，陈著也谈到“当是，彭德怀奉令率军执行”；在271页，“命令军长彭德怀率部诱杀王、袁两人”，学术界关于此事，已经非常清楚⁶⁸；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有关，彭德怀是负有历史责任的，但是也不致于负“等而上之”之责⁶⁹。

4. 在陈著中，俄国、苏俄与苏联的概念混用现象严重。仅举：第67页，“苏俄”和“俄国”同时使用；75页，“留俄”；137页，苏联；141页，苏联和俄国同时使用等。75页的“留俄”，肯定是错误的，应该是“留苏”；137页，应该是苏俄；141页，应该是苏俄。同时，144页，苏共和俄共一起使用，后者应该也是苏共。历史研究的概念要界定清楚，要在不同的时段，使用不同对应的国名或组织名称，特别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时，正如云庵说，“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的全称是‘俄罗斯苏维

件”，在当时基本都有文章发表，如，蒋广学：《一篇理论文章的命运及其思考：〈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的是非曲直》，《学术界》，2003年第4期，第205-215页）。

65 张海鹏：《“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42-46页；谷方：《评告别革命》，《求是》，1996年第15期，第14-20页，等。

66 刘巍：《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瞭望》，2011年第20期，第40-42页。

67 《高书评》，第120页。

68 “关于袁文才和王佐案的来龙去脉，已经非常清楚”。陈培均、吴直雄：《略谈袁文才、王佐之死》，《南昌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23-26转37页。

69 萧克、李锐、龚育之：《我所经历的政治运动》，第179-191页。

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1922年始称苏联。本研究（何著）跨越1922年，故称苏俄。其共产党组织名称同样几经变化，有俄共（布）、联共（布）、苏共几个时期，本研究在涉及不同时段时，即用当时对应的名称”⁷⁰。这才是历史研究的规范之方法。

5. 第216页，“革命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若非东风压倒西风，便系西风压倒东风”。此处引用毛泽东的“东风与西风论”，明显不合适，属于“往前移置”名词。“东风与西风论”，虽然，原出自于古典名著《红楼梦》，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明显源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⁷¹。高华教授，在一篇书评中也谈到此种现象，举例说，“‘个人崇拜’一词是1950年代苏联批斯大林后才流传的，何以在19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有这个词？将此词往前移置江西时期，当是作者和编者所为，那是不恰当的”⁷²。同样，将“东风与西风论”迁移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不恰当的”。

6. 第244页，“派亲信前往中共中央（包括赣南和闽西）、鄂豫皖和湘鄂西三大根据地”。这里的“中共中央”是什么意思？怎么还包括赣南和闽西，从括号中的内容看，应该是一个是地理方位的名称，从后面的内容看，三者应该是并列的关系，“中共中央”应该改为“中央苏区”⁷³。

7. 第460页，注释44，陈著的引文是“学生在原来的‘反饥饿’和‘反内战’口号下，遂又加上‘反迫害’三个字，继续激荡人，扩大民众离心离德的效应”。可是在引用的原著页码中，根本没有“反迫害”三个字。同时，陈著中，也没有把原著的书名表述完整，少时间的界定（1945-1949）⁷⁴。

8. 第474页，“白白死了二千万到四千万老弱妇孺”。此论断

70 何云庵：《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页。

71 青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东风压倒西风》，《百年潮》，1999年第4期，第39-47页；阎明复、朱瑞真：《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莫斯科会议（二）》，第19-46页。

72 高华：《解读博古、毛泽东、周恩来的三边关系——评〈博古和毛泽东〉》（上），《二十一世纪》，2009年12月号，第120-128页。

7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107页。

74 施慧群：《中国学生运动史（1945-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

存在的问题：一，数据史料来源问题，数据跨距 2000 万之多，杨继绳先生还认为“符合事实”⁷⁵；二，“老弱妇孺”是指年老体弱的妇女和年幼的儿童⁷⁶，不仅仅包括老体弱妇女和儿童，还有成年男女各类人群⁷⁷。

9. 第 476 页，第一段用三个“起码”词语，特别是“更不能后退的社会主义起码体制”。真不能理解此处的“起码体制”是什么体制？

10. 第 479 页，“毛泽东的失败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更可能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因于“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⁷⁸，“更可能”，虽不确切，但是，不能归因于一代知识分子，毛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如黄万里、顾准、束星北等一大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11. 第 491 页，“周恩来名义上是政务院总理，但在党内却只是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书记而已”。此语段有两处不当，一，“名义上是政务院总理”是什么意思？二，“党内却只是政务院党组干事会的书记而已”。周在党内是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党的领导，政务院成立党组（党组干事会）⁷⁹。周恩来，首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又是政务院党组书记的双重身份。这是中共的政治运作方式之一，到现在仍是如此，总理是国务院党组书记，同时，在党内的最高职务是政治局常委。第 492 页，图中的“政”系统中，怎么包括军事方面呢？区分不清晰。

12. 第 500 页，“进入北京之后，中共以华北人民政府为基础，建立中共中央政府”。这里的“中共中央政府”，明显表述不恰当，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⁸⁰。

13. 第 562 页，“签订和平协定”。此表述与历史事实不一

75 杨继绳：《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 82 页。

7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第 784、408 页。

77 “杨继绳先生也看到此问题”。《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 82 页。

78 “杨继绳先生也认为说得对，其实倒是杨先生的补充说明，抓住问题的本质”。《读陈永发史著断想》，第 82 页。

79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内部发行），第 195、242 页。

80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 6 页。

致，应该是“停战协定”⁸¹。也与563页的图片中“停战协定”的表述不一样，前后矛盾。

14. 第658页，“（建政后）任命其中享有清望者为国家副主席或正副部长”，“给予他们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代表的礼遇”。此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国家主席”，是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代会后，才有的政治概念，1949年，政协会议上，选举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⁸²；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称谓前后有变化，1949年政协会议时称为代表⁸³，新时期则称为委员⁸⁴，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是“代表”。

15. 第685页，“（罗隆基）竟然发言说道：所谓中共领导就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此论断，不是罗隆基的原话，其原话是“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⁸⁵。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伤了脸面，刺痛了心。因为罗隆基这句政治话语，表达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歧视。

16. 第688页，“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中，有十几万是小学教员，然而从所占人口比例来说，受打击最多最重的，仍然是高级知识分子”。此论断肯定不对，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而且参考文献原文中，也没有“受打击最多最重的，仍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论断⁸⁶。不知道为什么陈著中，为什么出现许多如此的现象，不尊重原文的意思。不知道陈著中的结论何来？“右派分子”中最多，而且受到打击最重的是基层右派分子，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江苏省是如此⁸⁷，全国更是如此“半数左右的右派是中小学校教师”⁸⁸，当然，受害最深的也是基层右派分子，看看杨显惠的夹边沟纪实系列

8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243页。

82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7页。

83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84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115-116页。

85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287页。

86 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308-309页。

87 谷彦梅、董国强：《一九五七年江苏某些地区中小小学反右派运动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1期，第89-95页。

88 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第48-70页。

著作⁸⁹，看看基层右派分子的回忆录或文章⁹⁰，会明白许多。

17. 第 689 页，“右派人物分成极右、中右和微右三种，其实这 55 万人可能只是‘极右’右派分子”。此论断，至少有三处不当之处：一，右派人物的分类，分为“极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等⁹¹，未在其他著作中见过“微右”的称谓，即使有，陈著应该给予参考文献注释。因为，后来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划分右派分子，工人、农民中的“右派分子”，不扣“右派分子的帽子”，起名曰：“反社会主义分子”⁹²。二，55 万右派分子，是一般党史专著对全国在反右派运动时，划右派分子的总数的估计，不能都是“极右派分子”，“极右派分子”是反右派运动时，划分的右派分子中处理最严重的分子，“极右派分子”是一部分⁹³。三，又出现“可能”一词，不严谨。

18. 第 741 页，注释 54 中，陈著说“关于大饥荒，有两本知识分子的日记值得阅读。这就张贤亮，《我的菩提树》和顾准，《顾准日记》的《商城日记》部分”。此论断中，把《我的菩提树》当作日记的一种，不确切，张著是一种小说体，出版的封面上，就标注为“当代小说文库”⁹⁴，文学界也是把它当作一种特别小说来看待的⁹⁵。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著作，但是，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同时，陈著还认为，“（饥荒史）宏观研究必须有微观研究配合，可惜这方面的书籍不多”。此论断与学界的研究现状不符合，其实对于“饥荒史”的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已经取得

89 杨显惠：《夹边沟纪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年。

90 许春耘：《我所经历的反“右派”斗争》，《江淮文史》，2006 年第 7 期，第 86-97 页。

91 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第 48-70 页；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41 页；曹树基、李楠：《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学术界》，2010 年第 1 期，第 180-194 页。

9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0-1957.12），第 231 页。

9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 310 页。

94 张贤亮：《我的菩提树》（封面），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 年。

95 谢勉，等：《〈我的菩提树〉读法几种》，《小说评论》，1996 年第 6 期，第 32-37 页。

重大学术成果⁹⁶。

19. 第 838 页，“摔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其中的“摔石头”，应为“甩石头”，陈著给的参考文献 407 页，清清楚楚⁹⁷，党史的习惯用语或专有名词，不能乱用。

20. 第 860 页，“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影响，还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两个口号上”。此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符合，“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固然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影响，无论从宏观⁹⁸还是从微观的角度⁹⁹，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最大影响”，肯定不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否则，陈著中参考的文献《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根本没有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文章¹⁰⁰，“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影响是打倒一切，各种武斗，对普通生命的残害¹⁰¹，没有看到文革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危害。

21. 第 861 页，引用的图片。一，没有注明来源；二，照片是 1964 年，毛泽东接见钱学森和陈永贵，时间与叙述的背景文革时期不一致。

22. 第 875 页，“难怪市井中开始传言他（华国锋）是毛泽东的私生子了”。历史著作是严肃的作品，不能有半点的虚假，此论

96 丁抒、冯容、杨继绳、曹树基、陈意新，等都作出重要研究成果，而且作者还写过关于饥荒史的书评，《〈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by Jasper Becker；〈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丁抒著；〈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李锐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7 年第 27 期。

9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407 页。

98 陈清：《工业学大庆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4 年第 6 期，第 34-38 转 59 页、宋连生：《工业学大庆运动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吴象：《“农业学大寨”的沉痛教训》，《炎黄春秋》，1998 年第 11 期，第 14-20 页、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

99 梁志远：《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炎黄春秋》，2006 年第 4 期，第 24-29 页。

100 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年。

101 郭天亮：《大动乱年代的艰苦抗争》，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中共中央党校，1994 年，第 27-33 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97-606、651 页。

断，没有史料来源，就是信口开河，而且还是市井传言。

23. 第 877 页，“他（华国锋）所说的现代化，实际上便是周恩来 1975 年所提过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四个现代化”。此论断中的时间“1975 年”是不对的。周恩来早在 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75 年 1 月，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四化”目标设想¹⁰²。

24. 第 880 页，“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政治吞噬其他人生层面的时代”，其中“其他”是什么意思？看不懂，不理解。

25. 第 903 页，“此后，便不再有不可平反的政治案子了”。此观点，明显是武断，而且是错误的，直到现在还有未解决的政治案子，特别是反右派运动时的案子，为证明其是准确性，只是犯扩大化的错误，还有中央级的五位右派分子至今“不予改正”¹⁰³。

26. 第 936 页，“任何一对夫妻，只要生产超过一胎，干部便要强迫堕胎”。此论断，肯定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政策不同，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82 年，还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生育”的政策¹⁰⁴，而且根据笔者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观察，在农村地区实行的是“一胎半政策”即一对夫妇第一胎生男孩，则要采取生育措施；若第一胎生女孩，则可以生第二胎，第二胎要是继续是女孩，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为要“男孩”来传宗接代，则要想方设法超生，逃避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处东躲西藏，才有“超生游击队”的说法，但是，一旦被抓住，则要采取手术引产等措施。因此还造成大量的，包括干群矛盾严重对立等社会矛盾¹⁰⁵。

102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39、479 页；薛培松：《四个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31-35 页。

103 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第 4-5 页；王海波：《中国最后一个右派—陈仁炳》，《世纪》，1995 年第 9 期，第 14-17 页。

104 孙沐寒：《中国计划生育纪事》，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年，第 126 页。

105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27. 第 956 页，“县、区、乡、村等行政单位”。此论断中，把“村”当作行政单位是错误的，“村”是群众自治单位¹⁰⁶。

28. 第 1042 页，“（毛泽东）不仅以中共党主席的身分出任新政权最高民意、最高行政和最高军事机构的主席”。此论断中，“最高民意、最高行政的主席”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最高民意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常委会；“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央人民政府即政务院或国务院，1949 年政协会议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国家最高政权机构¹⁰⁷。毛泽东从未出任此过最高民意机构的领导人。

（五）问而不答：陈著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影响阅读的问题

陈著一个重大的优点是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判断一篇文章或论著的学术水平，关键就看其提问的能力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从此角度看，显示出陈著的高水平，但是，陈著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此。杨奎松教授指出，“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但是提出的问题太多，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困”¹⁰⁸；齐锡生博士也感觉到，“对于某些重要问题，本书似乎还可以用更多篇幅加以阐述，让读者对如此重大事件当代‘革命性’能够获得更彻底的了解”¹⁰⁹。杨教授和齐博士都为陈著对提出的问题处理不够即“提出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感到惋惜，外审专家给本文作者的意见中也认为此问题是“最影响阅读体验的问题”¹¹⁰。这也是让本为同行的杨教授（研究中共党史的顶尖级专家之一），“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似乎不是很成功”¹¹¹。遑论一般读者，而且陈著目的是“写一本一般读者都可以读、也都喜欢读的书”，结果是适得其反，“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会感到不知所从”¹¹²，这是陈研究员以及陈著所

106 崔智友：《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第 129-140 页。

107 韩晓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概况》，第 6 页。

108 《杨书评》，第 188 页。

109 《齐书评》，第 212-213 页。

110 《外审专家给予作者的意见》，2024 年 03 月 09 日。

111 《杨书评》，第 188 页。

112 《杨书评》，第 189 页。

始料不及的。

确实如杨教授和齐博士所言，陈著的问题意识，特别强烈，大问题带着中问题，中问题包含小问题，问题套问题，类似俄罗斯套娃式的问题意识，连环问。在 2001 年修订版，此最大的问题依然存在。

1. 第 44-45 页，在导论中，陈著问“三个大问题”，也是陈著着力要解释的核心问题，在 2001 年修订版中比 1998 年初版，又增加许多小问题。对“三大问题”，杨教授质疑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关系”，认为陈研究员的解释“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从而影响涉及问题的判断¹¹³。在 2001 年修订版中，陈著对质疑的 1998 年初版 736 页、738 页与 970 页的论断，主要观点依然保持初版的内容。只是进行史实问题修订，而且有些还修改错误（初版 970 页）“轶出苏联模式”到（修订版 1008 页）“放弃苏联模式”。包括中苏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都走向最终的破裂，陈著的解释是一种表面化的现象，没有抓住本质的原因。历史多面相中，杨教授的提示，看到中苏关系破裂的真谛¹¹⁴。

2. 第 130 页，陈研究员又提出两个有价值的问题：“首先，中共内部除陈独秀和李大钊之外，很少有当时被认为大知识分子级的人物，初高中和师范生远多于大学生，党员以小知识分子为主；其次，中共党员中的日本留学和勤工俭学的学生远多于一般欧美留学生。这两个现象应该如何解释？”这两问题，对中共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产生不可估量影响的问题，也得到共产革命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证实¹¹⁵。可惜，陈著没有看到很好的解释；接着在 133 页，陈著一口气又提出五个问题；到 145 页，陈著又连珠炮式发问，其实这三个问题与 130 页的问题，意思较一致，可惜也没有得到解释；到 150 页，陈著回答一个问题，仅靠陶希圣的回忆录中，关于学历、办公桌的待遇不同¹¹⁶而确定“早期中共党员中，为什么留日学

113 《杨书评》，第 191 页。

114 《杨书评》，第 193 页。

115 丛小平：《通向乡村革命的桥梁：三十年代地方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转型》，《二十一世纪》，2006 年 8 月号，第 38-51 页，等。

116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陶希圣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年，第 73 页（此版时间超出 2011 年的时间限制，未看到陈著引用的版本，但是，内容一样，故引用）。

生比留欧美的学生为多”之问，显然过于简单又草率，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同时，陈著要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都是中共共产革命伊始，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杨奎松教授所说，有两个问题，陈研究员的以前两本著作已经作良好的解释¹¹⁷。但是，不可否认，“三大核心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其实陈研究员，所处的学术环境更有利于中国共产革命问题的阐释，原因在陈研究员与大陆学者交流时，已经表达出来：“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的装饰、掩盖和曲解”¹¹⁸。看来，陈著存在的问题解释上仍然有很多需要回答。

以上，提出五类问题与陈研究员商榷，因学识和能力，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期待学术界讨论，进一步推动研究中共党史，探讨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四、结语

陈永发研究员所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是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力作，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著名学者高华教授、杨奎松教授与齐锡生博士先后发表书评，并指出该著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1998年初版，进行修订，2001年出版修订版，2011年12月已八刷，足见，陈著的影响之大，受欢迎之程度。同时，陈著也是一部辉煌巨著，分为上下两册，1146页，时间跨度书目看是七十年，实际上是超过七十年，而且“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是一件学术盛事，惠及学界。但是，个人写中共通史，“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¹¹⁹。

但是，2001年的修订版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史实”错误的“硬伤”。本文在学术界对1998年初版书评的基础上，参考一系列学术成果，对2001年修订版作书评，提出五类问题，

117 《杨书评》，第191页。

118 萧延中：《“毛泽东研究在台湾”掠影》，第90-91页。

119 《杨书评》，第174页。

包括“语言或表述问题”、“学术规范或史料问题”、“史实问题”、“论点或观点问题”与“问而不答”等，说明陈著是有问题的经典之作。本书评与陈研究员再商榷，期待着陈研究员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回答读者所关切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革命研究中尚未解答的深层次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不能否认陈著是研究中共党史的经典之作。正如齐博士所言，书评“无非是书评人努力挑剔的结果，不论正确与否，它们都无法掩盖本书其他方面大量的优点”¹²⁰，此观点仍然适用于2001年修订版。相信这些也是陈研究员所愿意看到的，因为“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¹²¹，也更能促进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120 《齐书评》，第213页。

121 《杨书评》，第194页。

旧阵时：香港散文的文化记忆与地志写作

钟怡雯

摘要：回归后的香港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之下，原本的“旧香港”慢慢走调，产生了“本土香港的弱化”和“旧时光之崩解”。本土意识在高压环境下，渗透到各层面和场域，于是有了更多为“旧香港”留声留影的文章。两个主题逐渐成为散文的主流：其一，透过个人的生活史，去追忆“旧街区”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变迁，偶尔加上文史数据的考据，这是以空间为重心的“地志”素描；其二，以怀旧之笔，去重温某些日常消费空间里的“港味”，一种非常有“在地感”的“本色”，通常是以人物为重心的抒情小品。这两个主题，有些时候只关注一个老地方或旧街区的兴衰存亡，进而引爆作者自己和读者沉积于此地的文化记忆。本文针对1980年代以降的相关散文作品进行研究。

关键词：文化记忆；地志写作；香港；散文

作者：钟怡雯，台湾元智大学中语系退休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台湾现代散文；散文史。邮箱：yvchoong@saturn.yzu.edu.tw。

Title: In the Old Days: Cultural Memory and Topographical Writing in Hong Kong Prose

Abstract: Following the handover,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have influenced Hong Kong, gradually shifting the original "old Hong Kong" and resulting in a "weakening of local Hong Kong"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old days." Under an increasingly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 a growing local consciousness has permeated all levels of society, inspiring essays that preserve the voice and

imagery of “old Hong Kong.” Two prominent themes have emerged in contemporary prose: the first recalls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ssence of “old districts” through personal narratives, sometimes incorporating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ferences, creating a spatially-focused “landmark” sketch. The second theme nostalgically explores the “Hong Kong flavor” of certain daily spaces, portraying a sense of “authenticity” through character-driven lyrical sketches. Both themes refl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old neighborhoods and places, evoking shared cultural memories for authors and readers alik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prose works from the 1980s onward.

Keywords: cultural memory; topographical writing; Hong Kong; prose

Author: Choong Yee Voon,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Linguistics, Yuan Ze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Taiwanese prose,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prose. E-mail: yvchoong@saturn.yzu.edu.tw

前言

回归祖国之前，香港被承诺五十年不变，尽管大部分港人都不相信这种政治支票，但除了“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之外，也做不了什么。欢欣鼓舞迎接回归的香港作家极少。就拿西西来说吧，在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并正式通知英方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的那一年，她的《肥土镇的故事》（1982）以魔幻写现实主义精神，塑造了“浮土寓言/预言”——香港即将在繁华到极限之后打回原形，那是一种很深的焦虑。西西在稍早的小说集《我城》（1975），根据香港人在英殖民和祖国之间的政治处境，创造了“城籍”，同样预言了香港人的未来，“有城无国”的本土意识衍生出一场又一场的政治抗争，香港人逐年丧失一些东西，有些人甚至担心将来失去粤语文化。在确定回归之后，香港人开始了一波接一波的移民潮，自己的生存条件比什么都重要。

有更多港人是走不了的，还有不想走的，毕竟这是长久生活之地，他们准备面对社会体制的裂变。

一、时光缝隙里的旧香港

1980年代的香港散文不像小说和新诗那么紧张，怀念旧人旧事的散文不少，大多是专栏随笔，像小思《承教小记》（1983）收录不少个人的日常生活随笔，写电车、写菜摊、写山景，在浮光掠影中融入哲思，不太能够看见文字背后的香港地景和文化风貌，因为作者志不在此。那些会在文章里讨论回归的，多半是杂文，千把字，很难写出深刻的东西。此刻的香港尚未成为追悼的对象，大伙集中讨论的是未卜的命运，不是往日的辉煌。

忆旧，一直以来都是散文的大宗，刘绍铭在1986年发表一篇长达一万余字的散文《童年杂忆》（其实是七篇短文连缀成长篇），主要写的无非是自己童年的旧事，没有打算为香港文化或历史留下些什么，当然其中有些关于童工的亲身体验，也可以算是文化记忆的一小部分，但整体来说，文化记述的成分不高。对1986年的刘绍铭而言，眼前的香港还好好的，没有什么东西“即将消逝”，他还没产生为“香港而写”的动机。书名《旧时香港》（2002），重点在属于自己的“旧时”，而非“香港”。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从1970年代以降，可以读到的散文或随笔文集其实不多，香港的身影总是隐没在抒情文字背后，扎克《草窗随笔》（1970）是年轻文人诗意的哲理小品、利瓦伊陵《隔阁集》（1979）用一种存在主义视野来关切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淮远《鸚鵡千秋》（1979）主要在意现自我的性情与社会体制观念的磨擦，都是小小一本集子但收录七八十篇小品。思果《香港之秋》（1980）尽写身边人事和生活的点滴，跟《旧时香港》一样，重点在“秋”，香港只是他的写作位置；旅居沙田十年的余光中在《春来半岛》（1985）流露出一些九七忧虑，但没有对香港土地产生情感，散文里的文化记忆较少，更多是个人抒怀和杂感。

真正在散文里展现香港地理人文关怀，或以怀旧之笔进行（类）地志文学写作的，是辛其氏《每逢佳节》（1985）和叶辉《瓮中树》（1989）。土生土长的辛其氏在香港搬过十次家，住过很多地方，在自己的成长岁月中见证了香港社会的成长，尤其《上环（六题）》是当时较罕见的地方写作；《瓮中树》把越来越拥挤的城市空间譬喻成一个盛树之瓮，见证了香港的社会变迁，也记述了具有地志学意义的人事物，它是1980年代香港散文集里头，最

能够读出文化记忆的样本。最后不能忽略的，是也斯。

也斯在廿一岁那年写下《书与街道》（1970），那是他漫长的地方文化风景建构工程的开始，虽然是不经意的一笔。后来又写了《加盐的咖啡》（1974）、《地下车读诗》（1985）等象征着都市文人生活片段的记述文字。寸土寸金的香港，不是九七之后才进入都市更新，有很多老旧的住宅区陆续被翻新，有些珍贵的生命记忆被建筑商人无情抹去。他在《九龙城寨：我们的空间》（1993）记述了一段看起来很黑暗的“旧香港”：

怎样的一个空间？老人街连着老人院，大井街真是有大井，一切都仿佛名实相符，明白不过。但那你又怎样解释光明街呢？灯火通明的店铺，过去是白粉的主要供应地，黄赌毒在这儿有它们的地盘；不远的地方，转过几个街角，就是我们的朋友童年嬉戏之地、快乐自由的空間。妓女在一边出没，另一边有神父讲道、给贫民派奶粉。社工正在进行辅导工作；吸毒的人蹲在梯间吞云吐雾。放映老幼咸宜电影的戏院，晚上变成表演脱衣舞的场所。这是一个混杂的空间、一个不容易一概而论的空间，一个看来可怕但又那么多人尝试正常地生活下去的一个空间。这是香港。¹

也斯没有从九龙寨城于1847年扩建而成的历史说起，也没提及它曾经作为一处清军的军事驻地。这个无政府状态的飞地，从1899年以来累积了大量故事、冲突、拆迁、再冲突。1993年，也斯有幸赶在拆迁的前一年，进去里面看看这个最底层的香港，诚如他所描述的，每个狭小空间里都有在地住民的小故事，但它鱼龙混杂，肯定是一颗香港治安史上的毒瘤，非拆不可。尽管它见证了香港长期作为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尽管底层人民的生活也是香港的一部分，最后“巨大的铁锤敲碎了墙壁。九龙城寨迁拆了。重新思考这个环境，不是为了怀旧，是为了更好地思考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²，话虽如此，也斯发现好些香港人从九龙城寨里抢救出一些

1 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年，第53-54页。

2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55页。

老东西，企图保住一丁点旧时岁月的味道。一座城市迈向现代化的同时，还是会残留让人怀旧的元素。

在《录像北角》（1993），他为了拍摄诗人马朗笔下1950年代的北角，重新认识了那个已经被菲佣占领的地方，强烈的陌生感，让他对自己的记忆深感怀疑：“今昔对比，浪漫抒情的修辞与破碎凌乱的现实相对，也调侃了‘怀旧’了”³，语气里充满无奈。也斯是最专注于香港社会景观变迁的文人，有时他抓住街景的人文生态，有时抓住一个地方的场所精神，例如比较后期的那篇《湾仔的鬼魂》（2002），这里有日军贯彻酷刑的集中营，有英军误炸而冤死数百人的茶楼和戏院，新大楼盖不掉老历史，“这儿总是阴魂不散。口述历史里充满了亡灵忧郁的眼神。……当年日军的司令部和集中营，要老一辈的人才能说得出了在哪里了，英京茶楼和东方戏院也不是年轻一辈知道的了！”⁴。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历史变得异常脆弱，也斯感受到它的流逝，却做不了什么，只能很感性的去想象：“走过春园街，刚好碰见一个番鬼的鬼魂正在那儿徘徊”⁵。也斯对香港土地和建筑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无论是散文或新诗，都留下不少佳作，也留下感伤。

斯韦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 1959-2015）曾经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她说：“怀旧 *nostalgia*（来自 *nostos*—回家；*algia*—渴望）是对于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的家园之渴望。怀旧正是一种失落和流离失所的情感，但也是一种带有自己幻想的浪漫”⁶。一去不返的旧香港岁月，确实适合文人的怀旧，不管那个“小地方”或街区是否跟自己的生活史直接相关，但它毕竟是香港的一部分。九龙城寨是一个累积了百年移民史的底层生活圈，它的消失，在住民心中是一种刺痛，既不想承认自身跟它的关系，又感伤于它的逝去。这种来自城寨住民的怀旧是很矛盾的。也斯不是城寨住民，只是过客，他也是北角和湾仔的过客，他对这些地方的怀旧，比较“带有自己幻想的浪漫”，以及少许对城市历史的失落。

3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77页。

4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93页。

5 也斯：《也斯的香港》，第97页。

6 Svetlana Boym: Introduction: Taboo on Nostalgia?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Y: Basic Books, 2001, p.3.

二、时间开始蚕食一切

从 1960-1980 年代，三十年间，香港文人对地方建筑与文化记忆的写作，是比较随兴的。作为岭南文化大本营的香港，危险感不重。直到 1989 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在“未来的祖国”隆重上映，坦克辗过北京的大学生，也辗过香港人的恐惧，隔天，一百五十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喊出：“今日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再过八年，九七回归成了事实，原本虚无缥缈的忧虑，成了眼前的真实。2003 年因《基本法》引爆五十万人的示威，点燃“香港核心价值运动”的火炬，这还没完，还有反对维多利亚港填海、拆卸天星码头的钟楼，“旧香港”原有的生活样貌被再三动摇。

回归后的香港散文写作，基本上是温和的，政经局势的重大起伏不会掀起明显的浪潮，从 1997 到 2014 年“占中”运动期间，散文作家的叙事与抒情还是平和的。再往后，只有 2019 年的“反送中”才激起年轻散文作家的反抗性姿态。从社会事件不容易看出散文作家对都市空间和地方文化的态度，很多事情是缓慢进行的，时间悄悄蚕食一切。

先看人口结构的变化，“由 1997 年底至 2021 年底间，自然增长（即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仅为约 49.7 万人；单程证移入香港的人口有约 112.1 万人，撇除‘单程证’来港人士的港人净移出为约 68.1 万人。整合而言，过去 25 年香港人口增长约 93.7 万人，当中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新移民”⁷，根据 2022 年统计处人口普查，香港人口总数为 729.16 万人，换言之，每 7 人就有 1 名从大陆进来的“新香港人”⁸，再加上每年访港的五千万大陆旅客⁹，香港街

7 李若如报导：《“新·移民潮（二）”港过去 25 年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新香港人” 学者担心独特本土价值和文化遗产遭受冲击》，《自由亚洲电台》，2022 年 4 月 1 日，网址：<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hottopic/newhk-04012022112222.html>，检索日期：2023/12/08。

8 这是中共惯用的人口洗牌手段，往新疆移入大量汉族人口来降低维族人口比重，再推行普通话教育，用就正是这一招。

9 疫情前的 2018 年，内地旅客访港人次达 51,038,000。详见《高铁港珠澳大桥劲吸内地客 2018 年逾 6,500 万访港客创历史新高》，2019 年 1 月 31 日，网址：<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264262/>，检索日期：2023/12/08。

头根本被陆客淹没。

回归的结果：越来越多中国资金（红色资本）进入香港炒房，越来越多中国人定居香港，普通话跟粤语的对峙，都造成社会的紧张。香港人越来越觉得，原本的旧香港慢慢走调，有些生活的感觉和味道快速退散或者变形。港府在二十年内（1997-2018）动用169次《收回土地条例》¹⁰，强行收回大量土地，以及旧住宅和街区，“若细心走过深水埗、观塘等旧市区，便会发现这些年间，街道文化、旧区特色、小区网络又是如何被‘占领’：市集不见了、老店不见了、旧街坊不见了，变成了地产商的‘牙签楼’，变成了大型商场、变成互不相识的小区”¹¹。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趋势——“本土香港的弱化”+“旧时光之崩解”——形成尼采所谓的“记忆技术”（Mnemotechnik），他认为：“一个东西必须被毁灭才能保留在人的记忆中：只有那些持续受到伤害的人和事才能留存于人的记忆中”¹²，一去不返或即将消失的事物，造成伤痛之后，才会成为我们铭记、追忆、怀旧的对象。唯有“痛失”，才会刻骨铭心，否则很快便遗忘。

本土意识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渗透到各层面和场域，于是有了更多为“旧香港”留声留影的文章，抵抗“红色”资本与文化的入侵，散文在地志文学写作和本土文化形塑方面，有显著的成果。虽然从量化角度来统计，“专栏散文有退潮的趋势……，（因为）时政性和政论性，能揭示内情的这种吸引力显著地减少了”¹³，事实上比较感性的抒情散文，在质量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从相关散文集的出版情况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说来，两个主题逐渐成为主流：其一，透过个人的生活

10 香港 01 评论：《“收回土地条例”回归 20 年引例收地 169 次 林郑掌发展局后暴跌》，2018 年 5 月 5 日，《香港 01》，网址：https://www.hk01.com/article/18488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检索日期：2023/12/08。

11 邹崇铭等编：《重构香港：从庶民空间到小区更新》，香港：印象文字，2016 年，第 12-13 页。

12 这是扬·阿斯曼（Jan Assman, 1938-）在讨论文化记忆理论时引述的概念。详见扬·阿斯曼著，黄亚平译：《宗教与文化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107 页。

13 金惠俊：《香港文学论：香港想象与方式》，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22 年，第 53-54 页。

史，去追忆“旧（街）区”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变迁，偶尔加上文史数据的考据，这是以空间为重心的“地志”素描；其二，以怀旧之笔，去重温某些日常消费空间里的“港味”，一种非常有“在地感”的“本色”，通常是以人物为重心的抒情小品。

这两个主题“时分时合”，有些时候只关注一个老地方或旧街区的兴衰存亡，进而引爆作者自己和读者沉积于此地的文化记忆，但是某些旧街区摊贩的人情世故也会形成港味，此刻便出现旧街区与港味的“混纺”。

这里要谈到研究人类记忆的荷兰心理学家杜威·德拉伊斯玛（Douwe Draaisma, 1953-）的理论，他针对“怀旧情结”提出三点看法：（一）从神经生理学角度出发，我们的记忆力在二十岁时正处高峰，这时期储存下来的记忆最轻易而且最多；（二）根据研究证实，我们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经历“值得记忆的事”最多；（三）童年和成年早期发生的事，塑造了我们的个性，也指引人生历程，所以（日后）我们对青涩岁月的事件，记忆最深刻，反应也最强烈¹⁴。

杜威·德拉伊斯玛的理论很能够说明——为何迈入中年以后的作家总是怀旧。那段时光里有太多值得缅怀的事，何况那又是“香港崛起”的大时代，每个角落都有动人的故事。刘绍铭（1934-2023）在写《童年杂忆》（1986）的时候，正值五十二岁，穷苦的童年缅怀起来，竟然是回甘的。杜威·德拉伊斯玛也谈到记忆中的“痛点”，他说：“屈辱：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¹⁵，它必定形成终身难忘的记忆。失去香港，也会造成这样的“宏观效应”。

三、那一段缩脚的岁月

高度全球化的香港，在回归之后反而出现一股“逆全球化”（deglobalisation）的思潮，其实那不是个案，“跟与我们对网络空间和虚拟地球村的迷恋相反，怀旧情绪同样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这是一种对拥有集体记忆的小区之情感渴望，一种在支离破碎

14 杜威·德拉伊斯玛著，张朝霞译：《记忆的风景》，台北：漫游者，2013年，第240-241页。

15 杜威·德拉伊斯玛著，张朝霞译：《记忆的风景》，第225页。

的世界中对连续性的渴望。不可避免地作为一种防御机制重新出现”¹⁶。当我们从一个较宏观的香港散文史视野，去俯瞰九七后的散文史脉络，当能发现这一股写作热潮。

上述提及的“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在大部分香港散文里，并不是一种激烈的情绪，它更多是带有焦虑感的怀旧。《华文文学百年选·香港卷》（2018）的选编工作，有意识的呈现了这股热潮及其防御机制。选集分别收入了两批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卢玮銓《北角》（1997）、刘伟成《山道》（2004）、潘步钊《惆怅此情难寄——公屋的故事》（2014）、韩丽珠《旧时蓝田》（2016），此四篇属于“旧（街）区”主题写作；胡燕青《搭台》（2006）、黄国彬《缩脚岁月》（2009）、陶然《香港茶餐厅》（2009）、黄仁逵《得闲饮茶》（2014），则属于“港味”。这两种日常生活的滋味，在巷弄之间捍卫住“旧岁月”滋味的流失。

以《得闲饮茶》来说，黄仁逵写的是老香港人一大早到茶楼饮茶，天未亮，铁闸尚未升起，只开了一个小门洞，老板探出头说了一句：“上去自己开茶饮住先，咁早未有伙计”¹⁷，上楼去，早有三几个熟客坐在不同角落，大家都不急着沏茶，安稳坐看天亮。那是老香港人才会拥有的，才懂得享受的“慢活”。老板和熟客之间的信任，更是上一个时代的人情味。黄仁逵用粤语写下的“市井之日常”，还能维持多少年呢？

黄国彬《缩脚岁月》细述了茶餐厅必点的港式奶茶，以及拖地大婶大声吆喝的一句“缩脚”，这种毫不客气的服务风格，也是“港味”十足的。除了搭台（拼桌），胡燕青在另一篇《茶餐哲学》（2005）也刻划了这种“港味”：“在茶餐厅内，真小人真得可爱，伪君子无处伪装。没有人会为茶餐厅里的一顿饭悉心打扮，只有真正的老友（见面时先骂你两句才切入正题的那种），方会约你到茶餐厅去。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到此找寻个人角落”¹⁸，寥寥数笔，尽显港人生活本色。

港式小品，很多时候就在这淡雅中取胜，静静守住岁月里的

16 Svetlana Boym: Introduction: Taboo on Nostalgia?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Y: Basic Books, 2001, p.3-4.

17 钟怡雯、陈大为编：《华文文学百年选·香港卷·壹》，台北：九歌，2018年，第197页。

18 胡燕青：《长椅的两头》，香港：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

“旧”。

回归初期，率先登场的是叶辉《浮城后记》（1997），那是1992-1994年间的专栏作品，部分篇章描写了人与城市之间的精神互动；其后是邱世文《一人观众》（1999），也是典型的专栏，从粤语流行曲、移民恐惧、嗅觉香港、旧式电影院、二手书店、消失的风俗与行业，到大香港心态，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风气有诸多批评。叶辉的“防御意识”比较强烈。

接着，要谈小思《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2002），这是讨论香港文化记忆十分重要的一本书。小思在开卷第一篇《香港故事》里说：

身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常常想总结一下香港人的个性和特色，只要提起我童年生命背景的湾仔，就可说明这种爱恨交缠的景况。……不知不觉，无声岁月流逝。蓦然，我们这一代人发现，自己的生命和香港的生命，变得难解难分。离她而去的，在异地风霜里，就不禁惦着这地方曾有的护荫。而留下的，也不得不从头细看这抚我育我的土地；于是，一切变得很在乎。但，没有时间回头关注过去的身世了，前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¹⁹

岁月无声，却让人与土地的纠缠越来越深，城市和住民已经融为一体，谁也离不开谁，这时候下笔，更是纠缠不清。嘴里说不回头，小思却频频回首，《第二辑：行街》就写了《春秧街》、《北角》、《看铜狮去》、《大街风情》、《别矣红砖》、《行街》（画组之一）、《行街》（画组之二）、《老榕移居》、《花园道口的小丘》，每个“旧（街）区”街景都有深厚的情感和记忆的铭记，可以读出一个土生土长香港文人的恋地情结。这都是发表于1993-1996年间的散文，尚未回归，还没发生“本土香港的弱化”或“旧时光之崩解”的焦虑，所以行笔比较平和，娓娓道出属于自己的香港故事。第一篇下笔的时候，小思五十四岁，跟杂忆童年的

19 小思：《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香港：牛津大学，2002年，第2-3页。此书收录两篇同名的《香港故事》，此为开卷首篇（共三页），另一篇只有一页。

刘绍铭差不多。

与此同期的是陈云《童年往事：香港山村旧俗》（2003），陈云是专栏作家，此书从民国时期的香港一路写下来，重现往昔的风土人情；麦树坚《对话无多》（2003）是一部缅怀之书，特写了旺角、西洋菜街、旧区记忆；黄秀莲《岁月如烟》（2004）很有本土味道，她记述了旧香港的风貌和奋斗精神，也是一本缅怀之书；郑镜明《情陷大磡村》（2006）抓住了香港生活感，以及依附在旧街区的乡土气息，他写了茶餐厅、聋哑人书报店，以及被都市发展吞没的大磡村，有意图且完整的留下旧城区的文化记忆；类似灭村记述，还有庄元生《如梦记》（2016），他的老家上水石湖新村被地产商“发展”掉了，童年的记忆如烟消逝。从这几部散文集，可以发现香港作家的写作力道越来越重，因为眼前的香港事物正在崩坏，必须用文字紧紧留住它。

紧紧留住旧事物，会不会妨碍新事物呢？

罗维明《香港新想象》（2009）写出另一种矛盾心境，香港的公共硬件建设是有在进步的，但老旧的事物免不了在都市进步中失去，他在《伤心奶茶之歌》里说：

楼下就有家古老茶餐厅，有我们迷恋的六十年代装潢，
墙漆厚重与岁月齐沧桑，色调暗红就像肺腑倾吐出来的
伤感，坐在那儿饮一杯奶茶，会饮到集体回忆的沉重。²⁰

茶餐厅是旧时香港特有的，而且是非常庶民的餐饮店，它是很经得起怀旧的元素。其实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不管是那一个世代都好，港式奶茶即是一种典型的、怀旧的港味。翌年，他执导了一部纪录片《幻想香港》（2010），其中有很多想法来自这部散文集，他对未来充满理想，尽管那更可能沦为幻想。

话说回来，欧洲很多大都市都能留住旧事物和老建筑，老城区往往成为很多欧洲大都市的文化象征，为什么香港不可以？

不同的作家选择了不同的记忆方式，陈智德在《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2013）将文学、文化、地理作了一次大规模的融合，其效果远大于人文地理学意义下的一般性地志写作，所以叫

20 罗维明：《香港新想象》，香港：牛津大学，2009年，第10页。

《地志》，特别强调了“文”，存活于高度商业化都市空间缝隙里的文学和艺术，让地方增添了无比珍贵的人文精神。陈智德在《前记》里说：

我的文学启蒙不在学校或课本，而是初中时代旺角奶路臣街一带的路边书摊，继而是楼上的书店。²¹

他的文学生命正是香港人文环境孕育出来的，很多地方都留下少年陈智德的足迹。如此复杂的空间记忆，正如陈国球在序文中所述：

打开《地志》，还见到我的童年往事、我的青葱岁月，洒落在九龙半岛的西岸。“芒角”是我的“好望角”；爸爸跟小时候的我说：不要怕迷路，只要你记得弥敦道，你一定可以回到旺角西陲，你的家。像同时代的小孩、少年，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历险成长的实景空间；书，还是可以手捧揭页的。花近高楼，登楼访书可以望尽天涯；由弥敦道的“港明”，花园街的“寰球”，洗衣街的“新亚”、“南山”，西洋菜街的“田园”，到奶路臣街的“学津”、“学峰”、“文星”……记忆中就是不歇之数；最有象征意义的，莫如回转地下，离棺材店不远的“广华”，店内灰尘扑面，盈眼是朦胧书影。如斯种种，感荡心灵；《地志》对于一辈香港人如我，弦动共鸣自是萦回不尽。²²

透过许许多多的街道和书店，陈智德叙述了他的成长史。如果细读其散文，当能发现他所展示的高难度技法，有时借一个追思旧事的契机，勾出个人童年的生活动线，穿越不同的地景，像〈白光熄灭九龙城〉引进侣伦和叶灵凤跟九龙城的因缘，又从宋皇台展开文史掌故的陈述，最后是自己读到郭珑容的小说，找到在那时代里生活的自己：

21 陈智德：《地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台北：联经，2013年，第13页。

22 陈国球：《序一 我看陈灭的〈我城景物略〉》，收入《地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台北：联经，2013年，第5页。

九龙城的狮子石道、侯王道、福佬村道、南角道，都是我小时常去的地方。在油麻地乘坐三号巴士，或在旺角上海街登上十三号巴士前赴九龙城，是小时除了上学以外最熟悉的路途，……妈妈经营的两家店铺、始婆经营的时装店、姨婆开设的裁缝店都位于九龙城。²³

九龙城在他笔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十分迷人。另一篇《破却陆沉：从芒角到旺角》更是人文地理学的典范之作，不但用英文和粤语的谐音来考证地名，形塑了历史的纵深，在空间地理的描述上，有出色的立体感，每家书店所在的位置都很清晰，陈智德的生活史跟地方人文节点的连结，让文章有了文化记忆的重量。这让人想起叶辉《味旦书》（2011）里那篇《旺角是一条时光隧道》，这里也是叶辉的文学启蒙地。

陈智德把旺角的人文地理和历史典故写得如此严谨，无非是恐惧——“九七回归前的那几年，我们更恐惧历史将要被抹杀。拒绝简化后，还需建立对简化的抗衡，但我们可以找到多少抗衡的资源？”²⁴，这本书因此读来沉重，它是一颗成熟的硕果，同时也构成陈国球等香港学者和文人的集体记忆。当他们近期被迫弃港来台之后，这些散文里的每一巷弄，皆成乡愁。

前几年出版的韩丽珠《回家》（2020），写出落地生根的土地之恋，带有几分抵抗时局的街头运动精神。韩丽珠对香港有太多难以割舍的情结，从《菜园村》、《比身体更小的囚笼》、《旧时蓝田》，处处都潜藏着她的忧虑，香港已经失去主体性，作家只能守住自己最后的土地。在这里，我想借韩丽珠在2019年的一篇专访来说明一些情况，采访者黄桂桂说：“失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韩丽珠认为，香港人失去自己土地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十二年前皇后码头的拆卸。……十二年过去，中环湾仔绕道已经通车，但皇后码头则重置无期。‘再到后来的菜园村事件、新界东北收地……慢慢我们发现，很多工程、建筑，都不是为我们（香港人）而建。譬如建高铁，牺牲了菜园村，花了我们很多公帑，却不是我们的。’韩丽珠叹道”，“香港像正在剥落的石屎，刚开始时一小块一小块

23 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第32页。

24 陈智德：《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第99-100页。

地掉，大部分的人还未意识到有些东西正在‘失去’。直至有一天，大家才猛地发现，原来地下已遍布石屎碎——这里已成了一堵摇摇欲坠的墙——于是纷纷在墙身贴上便利贴。‘近十年，我们才强烈、明显地感觉到我们正在失去，而且消失得很快。因为失去，令我们开始意识到她的存在。于是，我们想用尽全力去保护这个家’。”²⁵

这种状况岂是一句“怀旧”便能舒压的？《旧时蓝田》写她出生之地——蓝田平田邨第23座，那个小小生活圈里有韦斯利小说、车仔面、凤爪排骨饭、雪人蛋糕，构筑成美好的记忆，早已构成她的“恋地情结”。后来经过几番重建，早已物是人非，韩丽珠的蓝田只能重现纸上，以哀伤的色彩。

旧香港正在消失，作家各自在散文里留住最熟悉的地方和事物，生活还是得照常进行的，差别在有人选择忍受，选择抵抗，或者被迫弃守。非不得已，没有人愿意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不管怎样，香港作家对深具地志写作意义的“旧区”，以及充满文化记忆的“港味”，都累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足够成为当代香港散文史非常的重要一章。

结语

不管是单纯怀旧的散文，有意识的文化记忆和地志文学写作，渐渐成为香港文学重要的发展方向。透过文字，香港作家留下逐渐（或已经）消逝的香港身影，是一件很感性的事。暗地里，它却是很理性的，因为“记忆是选择性的，这意味着记忆在揭示的同时必然也要遮蔽，揭示那些被选择的过去，而遮蔽那些未被选择的历史。萨特说，真相不是那么简单的。记忆的伦理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只不过是基于人性的限度在生存和死亡、记住和忘却、言说和沉默、忏悔和宽恕中进行的选择”²⁶。旧香港，或香港的“前世叙事”在被选择成为写作主题时，已经确立了作者的立场。一如我们

25 黄桂桂：《无根港人长出根 韩丽珠：我们因“失去”学懂“守护”》（2019/08/22），《香港01》，网址：https://www.hk01.com/article/36647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检索日期：2023/12/11。按：两段用‘’括弧起来的是黄桂桂引述韩丽珠的话。

26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138页。

选择用粤语“旧阵时”一词，去彰显那一股很本土的港味，无形中却排除了另一个“新香港”，在变化中的“进步”的香港。当然，“进步”可能意味着别的东西，包括资本的掠夺或意识形态的改造。那不是怀旧的部分，它只会成为文化记忆的对立面。真的很少香港散文会触及这一块，如果有，大多是香港的“新移民”。

文化记忆导向的地志写作和怀旧散文，无意中在进行一次本土香港人的身分认同，“最终的目的是想建构一个自觉、独立、具有历史连续性及完整感的自我，而这项工程恰恰是在不断地对他者进行划界、标志和确认中完成的”²⁷。怀旧散文必须要有旧时光可以缅怀，地志写作要有自己参过与的故事，新移民缺乏这一个条件，他们缺乏文化记忆，只能是无声的“他者”。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27 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第214页。



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进路 ——以中国与马来西亚为例

邢晶、何启才

摘要: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旨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共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的运作逻辑。中国与马来西亚隔海相望传统友谊深厚,“一带一路”的提出推动中马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然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对中马两国民心相通造成深远影响。本文以中国与马来西亚公共外交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从学理视角重构公共外交的模式框架,从实践维度重塑公共外交的传播路径,在后疫情时代重新构建以公关外交为主导,媒体外交为中坚,人文外交为主力,侨务外交为纽带的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进路,为中马命运共同体贡献更有实践意义和价值内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公共外交; 后疫情时代

作者: 邢晶, 文学院副教授,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邮箱: xingjing@bttc.edu.cn; 何启才,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研究兴趣是海外华人研究。邮箱: hkeechye@um.edu.my。

Title: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 The Case of China and Malaysia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tensively elaborated 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discourse systems of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ve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framework of public diplomacy.

Despite the longstanding history of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Malaysia, and the positive cultural exchanges encourag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 unrest and the recent epidemic have severely impacted these connec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define the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cusing on Sino-Malaysian public diplomac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n order to provide Chinese wisdom and strategies to the China-Malaysi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t is essential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new public diplomacy approach, emphasizing political diplomacy as the cornerstone, media diplomacy as the backbone, cultural diplomacy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overseas diplomacy as the connecting link.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ublic Diplomacy, Post-epidemic Era

Author: Xing J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i Malay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diplomacy. Email: xingjing@bttc.edu.cn; Ho Kee Chye,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i Malay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Email: hkeechye@um.edu.my.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全面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在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引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由之路。

2023年3月，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多次强调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思想与马来西亚“昌明大马”的理念高度契合。人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格局、国际秩序、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健康造成未有冲击，无形中将人类历史进程重新划分为新冠疫情前（Before Corona）和后疫情时代（After Corona）²。新冠疫情暴发加剧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沉渣泛起，使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中国全面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将为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新机遇。马来西亚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中马双边关系一直以来基础深厚，经贸、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2023年迎来双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2024年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重新定义中马公共外交的内涵，重新塑造公共外交范式，重新梳理公共外交路径，使公共外交成为助力两国关系行稳致远发展助力民心相通的现实进路。

尽管中马学术界一直基于两国公共外交的现实关切，尝试以西方公共外交理论框架为参照，构建基于中马国情的本土化话语体系，探索广受认可的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因此本文将探讨如何应对潜在风险拓展中马人文交流的活动空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语境下提升中国软实力，从本土研究策略重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中马公共外交的衍生逻辑、现实挑战、行为模式以及优化路径。

一、理论溯源：中马公共外交的衍生逻辑

伴随全球一体化进程，软实力提升逐渐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显性指标。“软实力”一词源于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的“Soft Power”，是“国际关系中除军事、经济以外的第三种实力，包括

2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疫情是“新冠肺炎疫情前（B.C.: Before Corona）世界”和“新冠肺炎疫情后（A.C.: After Corona）世界”的历史分界点。

文化、政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³”。进入新世纪，作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公共外交已经由独白式的单向宣传转向全民共情互动对话，这种转变体现出新型公共外交的对话性、协作性与兼容性。换言之，行之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能够实现人文领域的交融契合，促进政治互信与经济互助，最大程度实现国家间利益认同。

（一）中国式公共外交的理论演进

在国际政治与传播研究领域，“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专业术语最早是由 Edmund Gullion 在 1965 年提出⁴，泛指一国政府对目标国公众的外交行为。随后一系列外交术语衍生而出，如“合作外交、竞争外交、非政府组织外交、移民外交、政党外交、品牌外交、商务外交”⁵。目前学界达成普遍共识，公共外交与对外传播实践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新兴模式的转型，“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时代已经到来。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 Nicholas J. Cull 认为相较于传统公共外交形式，新公共外交更加强调非政府和非国家因素的主动参与，公众在公共外交中的主客体地位相互置换⁶，而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使更多民众参与到数字化公共外交成为可能。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对外战略目标在公共外交的理念与做法各不相同，如美国的“战略外交模式”，英国的“多层化外交模式”，日本的“商业化外交模式”，以色列的“族裔外交模式”，以及中东国家的“宗教外交模式”⁷。

近年来，中国学者重新对以“人民外交”为主要模式的公共外交内涵、作用、条件进行本土化解释。所谓中国式公共外交，可以理解为“国家为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由中央政府或

3 Nye, Joseph. S.,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13.

4 Gullion, E: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pp.4-21.

5 Leonard, M. & Stead, C. & Smewing, C: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p.115.

6 Nicholas, J.C: *Public Diplomacy, Lessons from the Past*,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 2009, pp.34-56.

7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23页。

者通过授权地方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行为体通过传播、公关、媒体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澄清信息、传播知识、塑造价值进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⁸。由此可见，中国式公共外交逐渐从国家事务的边缘走向中心，区别于传统外交形式是少数人对少数人的官方行为，更多倚重领导人与外交官的能力，中国式公共外交则是以“政府为主导，公众作为主体，媒体是关键，精英是中坚”⁹，借助国际传播、公关、援助等手段，以影响外部公众态度，进而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

（二）中马公共外交的话语体系构建

近年来很多国家在重视跨国企业、国际传媒、学术智库等非政府行为体作用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外侨资源¹⁰，国际移民群体逐渐成为国家对外交往中倚重的资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随着海外华人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华人资源为载体的中国公共外交实践逐渐成为推进民心相通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抓手¹¹。中国作为侨务资源大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首次于2011年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提出，是全球化背景下“外交公众化与侨务外交化融汇的产物”¹²，其理论内涵与行为动机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在公共外交对外传播时，难以将“普通民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全部纳入传播范畴，于是“精英效果理论”为外交实践指明了方向，即重点面向精英群体，通过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的影响力带动普通民众产生“跟随效应”¹³。换言之，华人华侨不仅作为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同时也

8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页。

9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第9页。

10 朱奕龙：《加强研究，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第1期，第43-45页。

11 刘泽彭、陈奕平：《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12 赵可金、刘思如：《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兴起》，《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第15页。

13 林逢春：《马来西亚华人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与制约因素》，《亚非纵横》，2014年第2期，第86页。

是公共外交的传播客体。然而以侨为桥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发挥华人华侨在公共外交中的桥梁作用能够营造国际舆论环境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将众多海外华人纳入公共外交队伍赋予外交职能，可能会产生国家间的外交问题¹⁴。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马来西亚华人角色置于中马关系框架下显得尤为重要。生活在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国家之中，马来西亚华人长期以来为维护华文教育与华人文化作出不懈努力，使马来西亚成为除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以外保留最完整华文教育体系以及中华文化的国家。马来西亚华人因双边互利需求使其成为中马经济合作的桥梁，又因对中华文化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使其扮演了中马文化交流使者¹⁵。作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即华人社团、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在中马公共外交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结合特定国别语境解析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内涵，中国对马来西亚公共外交可以表述为：以公关外交为主导，媒体外交为中坚，人文外交为主力，侨务外交为纽带，以增进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形象认知，提升中国软实力在马来西亚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活动。

二、局面反思：中马公共外交的现实挑战

当前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南北差距、复苏分化、发展断层、技术鸿沟等问题外溢产生负面效应，严重削弱了全球治理水平，深刻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列出中国快速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沿线所经国家存在较大政治不确定性、能否得到相关国家的思想认同、既得利益国家冲突、国际舆论的误读与曲解、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威胁等，都将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制

14 Suryadinata, Leo: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ISEAS, 2017, pp.113-122.

15 胡春艳：《“一带一路”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中马文化交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9-31页；陈实平：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软实力建设，《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4-112页；

约因素¹⁶。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对中国形象认知水平参差不齐，民众对待中国影响力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¹⁷，因此中国与马来西亚公共外交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值得反思。

（一）政局动荡与疫情交迭的不确定性

马来西亚新冠疫情始于2020年1月25日，随后每日确诊人数呈个位增长并最终定格在22人，疫情始终处于可控范围。然而在应对新冠疫情的关键节点，“二月危机”¹⁸导致政权争斗与疫情防控顾此失彼，大城堡清真寺万人伊斯兰传教士集会活动成最大感染源，加速马来西亚进入新一波疫情。尽管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严格的防疫政策努力压平病例曲线，然而病毒的持续变异导致日增确诊病例一度高达三万以上。随着确诊人数的迅猛增长，马来西亚一度成为东南亚疫情最严重国家。与马来西亚疫情交织叠加的是政治纷争加剧了政局的不确定性。自2018年“509”大选以来，2020年“喜来登政变”、2021年依斯迈沙比利接任慕尤丁成功拜相，直至2022年第十五届大选中希盟主席安华胜出，使得马来西亚政坛屡掀动荡。各政党间博弈日趋复杂，暗示马来至上主义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的进一步强化，本质上是马来西亚逆民主化趋势的延续。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呈现出下降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也在越来越多国家遭到质疑。在“一带一路”五通建设中，相较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硬件设施，“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软件配套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与认可，若缺少民意基础和社会根基则无异于“纸上谈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政治认同、经济竞争、领海岛礁”的博弈以及西方舆论涉华议程渲染下的“中国债务陷阱”（Chinese Debt Trap），使舆论纠偏释疑解惑或成当务之急。当今，马来西亚在外交领域选择大国平衡的对冲战略，而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马双边发展对

16 人民网：“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文）”，<http://ydyl.people.com.cn/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

17 席金瑞：《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民意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153页。

18 马来西亚政坛的“二月危机”，又称“二月政变”、“喜来登政变”。2020年2月前任首相马哈迪辞去职务，慕尤丁获选为新任首相。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具有引领作用。由于政局动荡与疫情交迭加剧了马来西亚国家的不确定性，导致中马公共外交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值得商榷。马来西亚社会对“一带一路”接受度取决于三个先决条件，第一马来西亚长期以来马来优先的族群政治，第二是州政府与联邦当局的共同愿景，第三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地缘政治的利益推进。现实情况是，尽管马来西亚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然而民众对于可能产生的债务条款和主权让渡仍存有顾虑¹⁹。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因称对方为“我的大哥”引发在野党抨击，被批有辱国格。因此，如何通过公共外交与马来西亚寻求更多务实合作，有效保障双边关系平稳发展，在平等对话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增信释疑消除偏见，实现合作共赢的利益最大化，实现更高水平的政治互信与民心相通，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新冠疫情对民心相通的破坏性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全球治理困境，对国际关系、民间交往产生深刻影响，疫情的冲击引发社会信任撕裂加剧人际关系疏离，为民心相通带来严峻考验。马来西亚学者安焕然在其个人社交账号写到“由于中国疫情暴发于武汉封城之际引发各国人民‘退避三舍’的恐慌，也让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成果受到挑战”。根据2022年3月马来西亚独立民调机构Merdeka Center与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合作展开的民调数据显示，39%的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偏高，12%持负面态度，其余45%则保持中立。值得强调的是，马来西亚华人族群对中国好感度指数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19 沈大伟：《中国在当代东南亚的角色》，《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第33-35页。

表 1：马来西亚民众对华好感度

	Favourable	Neutral	Unfavourable
Total	39%	45%	12%
Malay	28%	50%	17%
Chinese	67%	29%	3%
Indian	27%	47%	23%
Muslim Bumiputra	33%	54%	6%
Non-Muslim Bumiputra	32%	61%	6%

资料来源：Merdeka Center

在全球共同战疫的关键时刻，一场由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病毒溯源论”试图甩锅中国，捏造中国政府通过“口罩外交”“疫苗外交”影响他国的论调歪曲中国政策。由于东南亚是全球华侨华人最为集中的地区，疫情造成的恐慌与歧视令当地华侨华人处境艰难。“新型黄祸论”“中国异化论”构陷的种族主义话语死灰复燃，海外华人遭遇“恐华症”事件（Sinophobia）激增²⁰。虽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抗疫的努力释放善意，但也夹杂着异样声音。疫情初期，马来西亚中文媒体在进行报道时将新冠病毒称为“武汉病毒”；部分高校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强制返马中国学生集中隔离遭学生抵制；当地网红发布视频嘲笑中国留学生疫情期间防护过度；中国社交媒体充斥对“马来巫师‘施法’手抓病毒”行为的调侃讥讽；马来西亚全国新冠肺炎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停止使用科兴疫苗；中国产新冠自检试剂盒因未遵守马来西亚医疗器械管理局（MDA）的批准条件被取消注册。诸如此类的争议性话题充斥网络空间，大量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智主义言论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煽动负面仇恨加深误解偏见，长此以往陷入“塔西佗陷阱”²¹，官方叙事下的国家认知很容易被民间个体言行所消解。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公共外交领域的相对弱势以及硬件不足展露无遗，中国与马来西亚在民心相通建设仍面临诸多现

20 Sylvia Ang & Val Colic-Peisker: Sinophobia in the Asian Century: race, Nation and Othering in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4), 2022, pp.718-737.

21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指政府形象认知如果丧失公信力，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实挑战值得反思。

（三）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认知的复杂性

中国的日益崛起为海外华人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东南亚华人被所在国政权或主流社会压抑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得以重新释放，折射出中国强大的辐射效应，随之出现了“再华化”（Resinicization）的趋势。关于海外华人与中国崛起相关研究，大部分华人学者聚焦于海外华人与“一带一路”、中国软实力资源、原乡文化祖籍地认同等领域。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将华人群体视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不可或缺的载体，却缺少对海外华人的代际差异、华人社会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地区文化特点的考量²²。

长期以来在日益深化的中马关系中，马来西亚华人一直被视为架起双边经济合作的桥梁，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向友族发扬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面对马来西亚内政动荡与中国的崛起，长期处于马来优先的多元族群政策下的马来西亚华人将政治认同的挫败投射在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中寻求慰藉。然而在西方媒体不实信息、情感煽动以及信息茧房的侵扰下，华人群体可能出现对中国影响力的认知偏差与心理隔阂。意识形态的鸿沟以及西方民主价值观对年轻一代的渗透，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态度²³。于是在虚拟网络空间形成了“中华胶”“马来糕”“慕洋犬”的标签对立。根据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形象认知调查，在文化、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认知度较高，而政治和公民形象方面的认知度较低。甚至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国整体形象评价低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华裔。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对南海等涉及两国核心关切的无能为力，其政治及社会影响力受到种族意识的干扰以及马华社会长期出现的分裂等问题，是导致“认识中国、认同中国、认可中国”程度参差不齐的主因²⁴。因此中国在软实力建设对海外华人寄

22 吴益婷、蔡晓玲：《后现代精神与文化符号：马来西亚华裔青年的原乡重构》，《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5期，第76-77页。

23 吴益婷：《中国因素，认同变动与大马华人》，《当代评论》，网址：<https://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07/19/1-190>，取用日期：2020年10月4日。

24 陈奕平、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04期，第64页；胡春艳：《马来西亚华裔新

予厚望的同时，不可忽视文化流动与民族国家政治边界间的张力，如在多元族群建构的国家内部可能诱发族群关系紧张，使华人陷入两难境地。中国在开展积极的侨务外交时可能会危及海外华人的利益，中马双边关系曾出现因中国驻马大使与当地华人团体交流频密被指涉嫌干涉他国内政，引发主流社会猜忌的尴尬局面。因此，中国政府在充分发挥华人桥梁作用的同时，也要维护其作为他国公民的基本权益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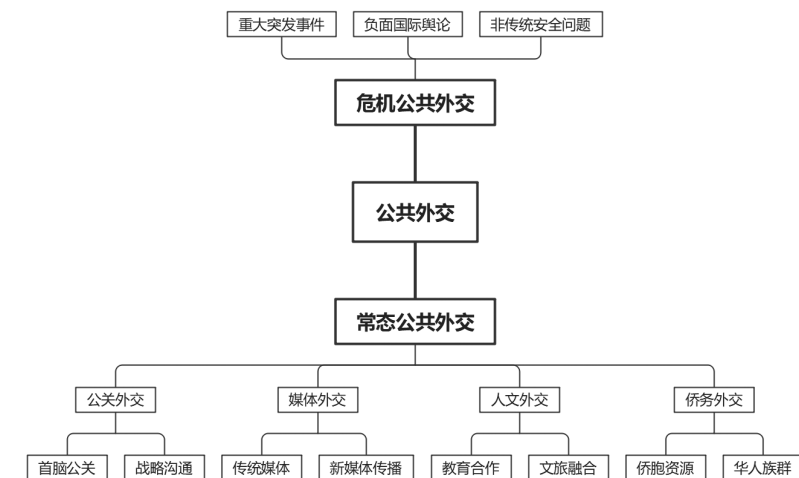
三、现实意涵：中马公共外交的实践模式

公共外交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建设，是新形势下完善外交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外交工作的开拓方向。经济发展见证中国崛起，“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积极响应，对持续深化政治互信，升级经贸关系，推进人文交流具有现实意义。结合特定历史背景与国际语境，新时期中国对马来西亚公共外交的实践模式可以总结为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关外交并存。一方面，在常态化领域开展以公关外交为主导，媒体外交为中坚，人文外交为主力，侨务外交为纽带的公共外交活动，充分发挥跨国企业、学术智库、海外华人华侨等非政府行为体作用，以增进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形象认知，寻求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最大公约数，进而提升中国软实力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面对重大突发事件、负面国际舆论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政府主体实施危机公共外交的风险管控与危机沟通，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议题以及随之引发的次生危机。

生代对中国的认知——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75页；高伟浓：《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民间桥梁：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协会中的华人角色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64页。

25 王夏兴、柯世池：《人才环流与华侨华——刘宏教授访谈录》，《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第148页。

图 1: 中马公共外交实践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制图

（一）人文交流是常态公共外交的内在驱动

根据常态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以政府为主的公关外交、以大众传媒机构为主的媒体外交，以教育文化部门为主的人文外交，以侨务部门为主的侨务外交。

其一，公关外交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不能脱离主权国家公共外交的运行轨迹。近年来，各国政府日益重视通过领导人对外出访开展多元交流展现国家形象，使首脑公关与战略沟通成为公关外交的重要组成。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作为疫情以来首位出访马来西亚的外长，就中马两国关心问题与马方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进一步全面提升中马战略伙伴关系。其二，媒介全球化时代媒体外交成为国家间外交系统与信息技术的耦合产物。当新冠病毒引爆舆论生态，信息疫情背后是国家间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握对外传播信息脉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宣旗舰媒体，成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应有之义²⁶。中国与马来西亚主流媒体探索多业态合作

26 央广网：“习近平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网址：http://china.cnr.cn/news/20160220/t20160220_521420357.shtml，取用日期：2022年10月24日。

模式，建立新闻事件日常互动与联合策划机制，为信息实时共享搭建平台，彼此交换立场和角度，改变西方媒体信息渠道垄断和话语霸权的现状，提升全球话语权。其三，中马两国建交以来在文化、旅游、教育、科技等领域开展了形式丰富的人文交流活动，以中国驻马大使馆新闻与公共外交处、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马来西亚孔子学院、中国厦门大学开设马来西亚分校等机构为代表的人文外交主体在人文交流中担负使命。受疫情影响，各国封锁边界传统旅游停摆，人员跨境流动受阻，中马两国旅游产业严重受挫。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携手中国旅游机构以南洋美食作为文化载体推出“2020马来西亚线上美食节”。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化身旅行推介官，通过VR导览在社交平台推出“VR游中国”栏目，云赏故宫雪景，云游万里长城，让马来西亚民众如身临其境般欣赏中国美景，彰显中国文化温度与智慧。其四，中国与马来西亚侨务外交的相关议题多集中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中国梦”构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作为侨务外交的“资源优势、传播优势、融入优势和长久优势”²⁷，推动中国软实力内向性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观念文化渠道、华社“三宝”、华人精英，还包括中国涉侨部门²⁸。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践行“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面向马来西亚华团华社招收培养高层次人才。中国侨务部门开展系列特色品牌活动，如“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演出、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夏令营、华文学校教师培训等。疫情中面对美国政客对中国污名诋毁，马来西亚华文媒体刊发署名文章《栽赃中国，可痛、可悲》予以舆论反击²⁹；马来西亚华人精英自发录制《为武汉发声》音乐视频声援中国抗疫。

（二）疫情援助是危机公共外交的标准范式

爆发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中马两国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重构了中马危机公共外交的标准范式。在抗击疫情中，

27 张梅：《中国侨务公共外交：问题与展望》，《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第58页。

28 刘泽彭、陈奕平：《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29 张翼卿：《栽赃中国，可痛、可悲》，《星洲日报》言论版，2020年5月12日。

中马两国始终保持密切沟通相互支援。武汉疫情初期，作为全球橡胶手套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马来西亚政府举全国之力调用1800万只医用橡胶手套以解中国医疗物资短缺之困。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马中友好协会、马来西亚民间救援组织“希望行动”等社会团体筹募医疗物资援助武汉抗击疫情。当疫情肆虐全球，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马来西亚卫生部捐助医疗用品，中国驻马大使馆全力打通物资供应链，以便马方能够从中国市场采购急需物品。中马政府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疫苗合作新亮点，签订《疫苗开发和可及性合作协议》，将马来西亚疫苗本土生产纳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健康丝绸之路”合作中，携手应对“疫苗保护主义”弥合免疫鸿沟。中国与东盟在10+1框架下凝聚共识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诊疗方案、防控方案。中国派遣医疗专家组奔赴吉隆坡、雪兰莪、沙撈越和沙巴，通过视频会议、在线问诊、接受采访等方式同马来西亚各界深入交流，答疑解惑。不仅如此，中马友好城市、中资企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向马来西亚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马来西亚中国留学生发表的《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中马合作抗疫记》《Hubungan China-Malaysia dalam Era Pandemi COVID-19》中文与马来文双语文章刊载于马来西亚主流媒体，用普通人的视角讲述中马合作抗疫故事。“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Bukit Sama Didaki, Lurah Sama Dituruni）成为中马共克时艰的真实写照。

四、实践升维：中马公共外交的优化路径

中国式公共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³⁰。尽管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落地，中国与马来西亚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助力亚洲经济走出至暗时刻。中国和马来西亚开展国际合作要摆脱思维视野的局限性，不应只聚焦经贸领域，更应该关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以公共外交为核心的人文交流

30 史安斌、童桐：《全球危机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28-31页。

也应成为主要议题。在后疫情时代，建议中马两国共同应对潜在风险，推进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通过扩展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公共外交路径优化，探索“基于华社并超越华社”的中国式现代化公共外交格局，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奠定民意基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一）公关外交：重塑各领域协同联动新格局

新时期，推动建立中国与马来西亚公共外交新格局，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力量为中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强化双边经济和文化合作交流、增进马来西亚民众对华形象认知，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软实力。建立新型公共外交格局要挖掘和扩大两国利益共同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马两国共享繁荣与发展。首先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背景下，两国政府启动中马合作高级别委员会，从国家顶层设计密切战略沟通，深化政治互信，为后疫情时代重塑公共外交范式提供崭新思路，统筹规划后疫情时代两国各领域合作，为多元主体同频共振参与到公共外交格局中提供可能。其次，中国作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马来西亚外贸复苏重要动力，建议继续优化贸易结构推进东海岸铁路、“两国双园”、阿里巴巴数字自贸区等既有合作，抓住中国经济恢复与“双循环”发展机遇，在绿色发展、5G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开辟新的合作增长点，使数字经济跨境贸易成为推动经济复苏新引擎。再次，在公共卫生领域以卫生外交作为切入点续推抗疫合作，理应坚持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属性，探讨升级新冠疫苗和新冠特效药临床试验、生产、研发等全链条合作，提升公共卫生合作水平和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共同打造中华养生的文化名片，深化中医药领域产业合作发展，发挥中医养生应对全球健康问题的独特价值，将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纳入到“健康丝绸之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最后，“经济落地文化先行”，人文交流在推动中马关系中无论是高层互访还是民间交流，在巩固传统友谊方面都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访问清华大学时发表题为“亚洲世纪：和平的基石，繁荣的纽带”的演讲时强调文明互鉴与经济互利共赢同等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应继续有序落实双边人员往来新路径，加强在媒体、智库、教育、科技、体育、旅游交流成为疫后人文合作亮点。

（二）媒体外交：重构数字化公共外交新趋势

当前，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构建亟待改进，通过新媒体技术构建全媒体国际传播阵营以阐释和传播中国发展观、文明观、人权观以及全球治理观，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从新技术与新平台两个维度重构了公共外交的主体、内容与传播方式，“政府与非政府人员和组织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大数据与算法实施和参与的外交活动”³¹，“数字化公共外交”应运而生，必将成为未来中马两国媒体外交的重要形式。一方面新技术赋能数字化公共外交传播，5G时代的媒体数字化催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全媒体模式，中马区域性媒体合作组织通过建立融媒实验室，优化云采集、云编辑、云管理等数字技术在国际传播领域应用。推动科技创新、智库研究、媒体融合的相互配合，进一步加强新媒体技术人才培养，使更多跨文化、跨语言、跨媒介的综合性人才在中马传媒生态体系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平台之于数字化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体现在宏大政治叙事背景下主流媒体的话语构建容易被抵触，而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公民新闻则借船出海另辟蹊径，将触角延伸至传统主流媒体无法触及的领域，成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全新尝试。新媒体公共外交应把梳web 3.0时代社交网络传播链条，发挥社交媒体平台意见领袖网红达人的角色功用，用汇通中马的叙事话语生成更易接受的共同体内容，实现文化传播的在地化。为社交用户提供可积极参与表达的公共空间，加强民众间的双向交流，及时关注民意反馈。国际传播化被动为主动，借船出海不忘造船出海强化大外宣格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平台矩阵，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与此同时作为国家传播战略的主体，一线使领馆工作人员、跨国中资企业对外宣传人员应就如何做好公共外交工作，如何实现公共外交传播的多样化与精准化，如何提升信息发布舆情应对能力，如何与当地媒体展开合作进行分众传播，如何提升话语叙事能力塑造矫正国家形象进行思考，把握当地媒体舆论风向，由“他塑”转为“自塑”。值得强调的是，数字公共外交使对外传播更具人性化的同时，也要

31 郭毅：《数字化公共外交：实践困境、理论缺陷与伦理风险》，《未来传播》，2021年第5期，第40页。

关注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³²。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应充分借鉴非英语国家媒体的海外传播经验，学习掌握国际传播规律，在平等互信包容尊重的话语基础上，用准确、生动、富有亲和力的语言将中国声音本土化表达，突破既有瓶颈做好中国故事的阐释和推广展现中国故事背后的价值，才能让双方民众看到两国合作所能带来的“共同体获得感”。

（三）人文外交：重建共性公共文化新产品

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在对外传播中往往陷入误区，将过多精力集中在对外交政策和价值观念的解读上，或是停留在传统文化形象符号的输出。如果输出文化形象符号与目标国民众的生活相距甚远，遑论影响他人的精神世界。实践证明作为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公共外交在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前提是重视和强调受众对象的差异性。第一，文化的接近性使华人族群在文化背景、价值观体系、宗教信仰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迁居南下的马来西亚华人将中华文化带到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并与在地文化融汇传承，书法、绘画、剪纸、绣球、武术、相声、醒狮等文化技艺的传承发展折射出华人为弘扬中华文化的不懈努力。时隔三年因疫情延期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以“天工开物，文化古今”为主题正式回归。第二，两国政府应共同努力推陈出新，助推公共外交内容更加丰富多元。中马公共外交从“主体性、针对性和参与性”转变思路探索官民并举的交流形式，尽可能避免宏大政治叙事，积极寻找共性文化特征，避免不同文明相遇时可能产生的“文明冲突”造成“文化休克”³³。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马人文外交合作的生动例证。中马应携手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共性文化产品及爆款IP，从草根群体深挖文化传播的分众表达，有助于其他族裔加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加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的对话，推进回儒文明和谐共生。中国驻马大使馆连续数年举办斋月捐赠活动为马来社区捐赠物资包，印证中华文化所倡导仁爱

32 赵鸿燕、李金慧：《伦理对道德的超越：新媒体公共外交的伦理探讨》，《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冬季刊，第77页。

33 袁靖华：《建设共同体话语：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的思维与路径》，《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第59页。

助人与伊斯兰文化中团结互助的斋月传统不谋而合，为中马公共外交注入活力。第三，两国通过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在旅游、教育、体育等人文领域继续加强交流，借助文化艺术传递能量凝聚人心，成为文化包容与文明互鉴的伙伴。中国驻马前任大使白天通过在线方式为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直播带货”，赋予马来西亚特色产品独特的文化内涵。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将“云观展”迁移到线上，为华夏文化联通伊斯兰文明增添动能。最后，中国形象符号对外传播应与时俱进，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化国际化元素。国际传播中应充分发挥共同价值观的话语优势，在新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与经济成就的故事，使中国式理念与模式被更多人了解，是国家形象建构的应有之义。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大贡献是实现了中国文化符号系统的拓展与延伸，通过全新的流行文化元素展现新时期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马来西亚独中学生在冬奥会期间表演主题曲《一起向未来》舞蹈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意涵。人文外交实现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化，在公共外交能力共建中思考如何提升国际传播素养，通过建立个体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意识，使海外媒体、跨国企业、学术智库、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华人华侨、留学生群体，甚至走出国门的游客等多元主体，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对外交往格局中。

（四）侨务外交：重置海外华侨华人新角色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指出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凝心聚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加强华侨、归侨、侨眷代表人士工作，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侨服务”。海外华人的表述已不再出现在国家官方文件的论述中，再次明确中国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为华侨、归侨及侨眷。因此在强调侨务资源的文化纽带作用时也不应刻意模糊华人华侨的边界。一方面于华侨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国际友好环境。在马来西亚开展侨务公共外交要完善以“根、魂、梦”为引导的大侨务发展格局。维护侨民的正当权益，推动和谐侨社建设，着力涵养侨胞资源在对外交流中的催化剂作用，引导海外华侨支持中国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马人文交流，塑造大国侨民形象。中国政府正在追求更加积极的大侨务政策，使各类侨务活动品牌化、机制化、常态化。另一方

面于华人是以认同为桥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促进中马文化与价值的互鉴与交融。中国对马来西亚开展公共外交务必落脚到与当地华人的利益趋同点，发挥华人群体“联通彼此”的桥梁纽带作用。运用“精英效果理论”集中资源将具有影响力的华人精英作为传播对象，影响带动其他族裔了解中华文化。中国政府只有与马来西亚政府保持良性外交关系，在国家关系中保有族群政治的敏感性，根据所在国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策略，与当地华人保持适当距离使其更好融入主流社会，才能真正惠及华人群体，实现国家侨务外交与海外华人的双向奔赴，为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参与到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格局中提供理论依据。

结 语

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和平发展面临挑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³⁴。中国主张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全球治理的实践探索，贯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隔海相望的好邻居，经贸互利的好伙伴，中国与马来西亚定将在亚洲经济复苏中发挥更为深远的区域意义。中马公共外交实践证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引导公众认同，开放共享机制互利普惠开拓创新，扩大知华友华的朋友圈，“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多元语境下形塑“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民公共外交”进路的深层次探索。

参考文献

1. 陈奕平 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04期。
2. 程曼丽：《新时期的国际传播：挑战与机遇并存》，《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0期。

34 人民网：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2/c1001-32406046.html>，取用日期：2022年10月14日。

3. 高伟浓：《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民间桥梁：东南亚国家对华友好协会中的华人角色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
4.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5. 胡春艳：《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国的认知——基于田野调查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4期。
6. 胡春燕：《“一带一路”下的马来西亚华人与中马文化交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7. 林逢春：《马来西亚华人在推进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与制约因素》，《亚非纵横》，2014年第2期。
8. 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第1期。
9. 刘泽彭、陈奕平：《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10. 沈大伟：《中国在当代东南亚的角色》，《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
11. 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12.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13. 钟新：《新公共外交：软实力视野下的全民外交》，《现代传播》，2011年第8期。
14.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5. Gullion, E: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2.
16. Hong Liu & Guanlie Li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Ris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2019.
17. Leonard, M. & Stead, C. & Smewing, C: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18. Ngeow, C. B., & Tan, C. B: Cultural Ties and States' Interest: Malaysian Chinese and China's Rise. In B. P. Wong & T. Chee-Beng (Eds.), *China's Rise and Chinese Overseas* (pp.96-116).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8.
19. Nicholas, J.C: *Public Diplomacy, Lessons from the Past*. Los Angeles: Figueroa Press, 2009.
20. Snow, N: *Valuing Exchange of Persons in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Routledge, 2009.

李碧华小说九七前的焦虑书写

林淑钢、蔡晓玲

摘要: 1983 年 7 月 12 日, 中英对香港政权移交交接事宜持续一年谈判。纵有邓小平五十年不变一国两制的承诺, 但前有西藏自治区多次遭到干涉之鉴, 八九年民运等事件, 引发香港社会前所未有的恐慌和移民浪潮。九七过渡期催生香港独特身份认同, 同时也刺激香港作家大量创作涉及地域、身份与文化书写。活跃于 70 年代的香港作家李碧华, 透过大量改写经典小说、书写死亡和鬼魅等方式, 积极探索大陆与香港当代政治、经济利益、社会文化等矛盾。她的悲剧创作延续鲁迅的故事新编的创作手法、融会针砭时弊的风格, 改写出《青蛇》《霸王别姬》《黄色娘子军》等更符合时代意义的作品。有鉴于此, 本文将通过文史互证比较法去分析李碧华九七前小说的创作风格, 探讨九七回归前香港人民的焦虑意识。

关键词: 李碧华; 小说; 香港; 九七回归; 焦虑书写

作者: 林淑钢,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香港当代文学。邮箱: limsokyin0428@gmail.com; 蔡晓玲,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华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邮箱: emilysawling@gmail.com

Title: The Pre-1997 "Anxiety-filled" Writing in Li Bihua's Novels

Abstract: On July 12, 198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finalized a year-long negotiation regarding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Despite Deng Xiaoping's promis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events such as the interference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had instilled significant anxiety in Hong Kong, triggering a wave of

emigration. The impending handover fostered a unique sense of identity among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influenced local writers to produce works that explored themes of reg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nuances. Prominent among these was Li Bihua, an active Hong Kong writer in the 1970s, who extensively reinterpreted classic novels using themes of death and the supernatural to delve in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in both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Her tragic narratives, reminiscent of Lu Xun's storytelling techniques and incorporating satire, resulted in reimagined works such as *Green Snake*, *Farewell My Concubine*, and *The Yellow Woman's Army*, aligning more closely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This study employs a method of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examine the stylistic elements in Li Bihua's pre-1997 novels, aiming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anxieties of the Hong Kong populace prior to the 1997 handover.

Keywords: Li Bihua; novels; Hong Kong; 1997 handover; anxiety writing

Authors: Lim Sok Yin, Master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 Email: limsokyin0428@gmail.com; Chai Siaw Ling, Senior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emilysiauling@gmail.com.

一、前言

香港九七的主权移交，对香港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且深远影响。即使邓小平承诺一国两制的体制五十年不变，但回顾中国历史，诸如西藏自治区多次遭到干涉，无不刺激着香港人焦虑情绪。根据黄国钜在《从悲剧看香港的命运》提到：

中英谈判初期，港英政府底下的华人精英邓莲茹、钟士元等人会见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表示对中共一国两制的承诺没有信心。他们举西藏的例子，

当初中共也答应入藏十七条，后来也是变了。¹

在这个基础上，本文主要参考大陆解放后的近代生活方式，以及对比大陆社会主义和香港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经济体系。特别是香港在 60 年代末已经经济腾飞，反观大陆经济尚未开放，还频繁出现饥荒、政治斗争等问题，导致香港人民担心自身的利益可能会受损或出现倒退。根据《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提到，自然环境和秩序出现极大的变化也是导致人们容易焦虑的因素：

文化价值模糊了也是焦虑因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有一致的、被外部如社会和种族任何的价值观，由此使人们在生活中产生空虚感，进而难以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感或稳定感。²

1983 年 7 月 12 日中英对九七香港主权和交接事宜进行持续一年的谈判。在面对随时可能被收窄的自由、突变的政权、身份转移与未知的社会发展，港民进而显露担忧、无奈、绝望等消极情绪。李碧华在隔年出版了以女鬼为创作主体的《胭脂扣》，后来更在九七回归前出版了许多讨论香港与九七的鬼魅题材小说，她以灰暗、冷冽的笔锋去刻画港民颓丧无助与焦虑的情绪。

李碧华大胆取材中国经典小说如《白蛇传》、《金瓶梅》，重新赋予人物新剧本但却又指向“命运不可违”的悲剧。此外，李碧华也经常以聊斋式书写当代香港和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小说中天马行空的鬼怪、拟人化的创作旨在揭露、暗喻或讽刺政治局势、揭露香港现状等。小说更巧妙地结合史料，反映香港百姓焦虑的原因和理由。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运用文史互证比较法，探讨李碧华九七前改写经典小说的时代意义、鬼魅和死亡结合史料和纪实书写的特点。在这个基础上，针对小说和历史事迹进行相互验证和交叉参考，分析香港人民九七前的焦虑成因。

1 黄国钜：《从悲剧看香港的命运》，思想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本土与左右》，台北：联经出版，2014 年，第 170 页。

2 邹枝玲、程黎（译）：《焦虑症与恐惧手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8 页。

二、故事新编的时代意义

李碧华故事新编的创作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仿效了神话，以及致敬传说二次创作鼻祖——鲁迅的《故事新编》。虽然鲁迅在序言称这部作品并非他的满意之作：“油滑是作品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³行文中批判传统礼教、固步自封的寓意被后世作者们广为模仿。比如在《补天》中，女娲辛苦造人，却换来人类以当代“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⁴礼义廉耻的道德思想去绑架女娲的裸体行为。

这类带有批判意识的创作，在李碧华的小说改编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她通过中国古代经典的改写，嘲讽当权者总是一面推崇仁义道德，一面干着吃人的思想。比如在《青蛇》中，李碧华揭示了法海的道貌岸然，满口佛法逼迫许仙遁入空门：

法海悠悠道曰：“上山、入寺、青盘、红鱼、清风、明月。我与你，内守悠闲，躲脱尘嚣，于深山密林之中，得享一片空寂。”

“不，”许仙急了，“不不不！师父，请放我回去吧。我与佛无缘。”⁵

法海虽有深厚佛法修行，一心斩妖除魔。然而，在面对青蛇诱惑时始终自命不凡拒绝承认拥有世俗情欲。经李碧华改写后，法海更像是刻意拆散有情人、刻意“勾引”⁶，许仙从而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种以消除社会弊端为借口的做法，实际上设计思想改造是当权者的一种洗脑手段。与此同时，故事经过改编后并未结束于白蛇被压在雷峰塔下，反而穿插了红卫兵闹革命的历史，最后误放白蛇：

3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1-342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41-342页。

5 李碧华：《青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02页。

6 李碧华：《青蛇》，第103页。

明天他们又不知要去破坏哪座塔，哪座寺庙，哪座古迹了。反正这是他们的功课。也许每一座被砸烂的文物底下，也镇了一个痴情的妖！感谢文化大革命！革命行动是理性的化身，打破世界的常规秩序，叫受镇压的，得到超生。⁷

她深刻地描写了革命时期年轻人的批斗意志，在掠杀的同时也为释放白蛇作出贡献。艾晓明称，“李碧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整个叙述带上亦庄亦谐的风格。”⁸李碧华以诙谐幽默的语气和夸张荒谬的方式，以旁观者的港人身份检视中国历史，并提及盲目革命并未帮助社会取得进步。如在《黄色娘子军》中，她描写了一群盲目革命没有思想的农民妇女沦为男人玩物却不以为意。

此外，在李碧华在故事新编中也加入了新移民涌进香港的现象，如《霸王别姬》的段小楼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的单玉莲在大陆经历劳改后寻机到香港定居。尽管经常遇到警察搜证或遭人唾弃，也不影响他们用着新移民身份占有香港资源、享受自由生活，反映了大陆居民对香港作为高度发展城市的心驰神往：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公共援助，又把着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⁹

哟，是无线。哟，是亚视。哟，是英文台……轻微不可闻的科幻。¹⁰

然而，这些成功偷渡到香港的个体通常缺乏教育背景，除了当

7 李碧华：《青蛇》，第 127-129 页。

8 艾晓明：《戏弄古今：谈李碧华的〈青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和〈霸王别姬〉》，黄维梁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 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香港大学中亚书院，2000 年，第 576 页。

9 李碧华：《霸王别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204 页。

10 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收录于李碧华：《胭脂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160 页。

苦力之外，也可能从事非法活动，引发更多社会问题。加上蜂拥而至的外来者挤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跟本地人争夺工作机会和居住场所，也是本地人所担忧的。

于此，李碧华还探讨了新移民和香港人在港的心态差别。虽然香港人也是早期广东过来的难民，但经历了英殖民时期、战争，早已视香港为落地生根的地方。相比之下，新移民来到香港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并没有对香港产生归属感。比如，在《潘金莲之前世今生》中，单玉莲在香港享受豪宅、专属司机接送和纸醉金迷的生活后，仍旧产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香港？”¹¹的疑问。段小楼在香港定居后仍旧明确地对程蝶衣说出自己不喜欢香港，也对香港的未来完全无感：

香港人至为关心的，是在一九九七年之后，会剩余多少的“自由”。小楼无心恋战，他实在也活不到那一天。什么家国恨？儿女情？不，最懊恼的，是找他看屋的主人，要收回楼宇自住了，不久，他便无立锥之地。¹²

对于单玉莲和段小楼而言，香港只是一个落脚之处，仍旧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1972年4月，香港提供身份证给非香港本土出生的新移民永久居民证件。其证件以颜色甄别“外来者”和“香港人”的身份，这也让本土居民对香港产生更深厚的本土意识。因此，本土人便对于目前仍是绿印、但只要住满七年未来就享有黑色印章证件的永久居民，认为这些人的到来是在抢夺资源：

由于香港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而大陆则仍旧“一穷二白、贫瘠交迫”，拥有居留证即等同可以分享经济成果，故黑印居民变成了“本土、先进、富裕”的象征，身份优越，二绿印居民则隐含“新来者”，有“外地、土气、贫穷”的意味，身份、地位较低。¹³

11 李碧华：《潘金莲之前世今生》，《胭脂扣》，第207页。

12 李碧华：《霸王别姬》，第224页。

13 郑宏泰、黄绍伦：《身份认同与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香港中文大学

身份的差别、对香港的归宿和期待，影响了本土人和外来者的行为思维。李碧华通过故事新编，衔接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也反复探讨香港人和新移民对香港的心态——本土人视香港为“家”；新移民则视香港为“避难所”。

总括而言，李碧华的故事新编延续了鲁迅针砭时弊的创作风格。在作品中反对当权者扼杀人民的思想，使人麻木而失去自主思维。另外，她在小说中也多次探讨新移民在港如无业、或卖淫，可能衍生的社会问题。最后，她对比香港人和外来者对待香港的心态，描写了外来者只为赚钱和共享资源，并非对这片土地有感情。

三、鬼魅书写与死亡意象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志怪小说的鬼魅书写除了是传播宗教的主要载体之外，也是探讨时代思想特点的直接方式。再加上香港“承接华夏志怪述异之余绪，兼及英国诡奇故事之流风，正是中西鬼事之乡，”¹⁴ 身为香港本土作家的李碧华在小说中也因文化熏陶自然流淌了许多鬼魅元素，包括鬼魅电影小说《离奇》、七卷怪谈精选集和疫情期间出版的五本乱世小说来“杀出阴司路”¹⁵。

虽然大部分的单篇鬼魅小说创作年份已经无法精确考证，有的探讨九七内容的鬼魅小说更在九七后才结集出版。这种创作动机足以证明九七对香港的特殊性，以至于在作品中值得一再被提起。王德威在《历史与怪兽》中认为，鬼魅创作即是招魂：

就字源学考证而言，“鬼”在远古与“归”字可以互训，是故尔雅有言：“鬼之为言归也。”鬼魅不断回到（或未曾离开）人间，因为不能忘情人间的喜怒哀乐。这一梦魇式的漫游回归，引发一种诡秘（uncanny）的征候。¹⁶

编：《二十一世纪评论》，2005年12月第92期，第8页。

14 陈云：《香港大灵异》（二集），香港：花千树出版，2013年，第1页。

15 李碧华：《离奇》，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第9页。

16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第234-236页。

王德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和朱天心《古都》为例，作品中虽然并没有出现鬼魂，但所营造出如真似幻，让主人公陷入感知混乱而形成鬼影幢幢的“鬼气”¹⁷。而李碧华也在小说中极力营造出这种让人感到紧张的“鬼气”的风格，打造一种虽无鬼但依然可怖、压迫的氛围，比如在《饺子》中艾青青首次探访月媚阁的私房菜饺子馆：

四下杂乱，但堆满一些时尚杂志八卦周刊，全是最
新期数，这儿追得上潮流，待客之道又下本钱。不过
“满天神佛”，既拜关公观音，又奉吕祖佛陀，还有一
休小和尚。怪怪的。

“督——督——督——督——”厨房传出一阵剁菜
剁肉声。¹⁸

李碧华以装潢门面描述了月媚阁正面且充满正气的地盘，然而就在这佛光普照的地盘，却干着吃婴胎饺子的生意，形成了强烈的正邪对比。艾青青企图用极端的婴尸回春法，小说映射香港人企图留住时间，希望九七永远不来。与此同时，小说中最具“鬼气”的媚姨透过一连串的举动让读者感受到她生人勿进的诡异感。她特别喜欢在客人吃饺子时以一首壮烈的革命歌曲《洪湖水浪打浪》作为余兴节目：

“洪湖水，浪呀嘛浪打浪，
洪湖岸边是家乡……”

唱着唱着，黄月媚忘了自己身处何方，何年何月何
人，她只记得，那些最青春靓丽的日子，又回来了。在
她举手投足载歌载舞之间，幽灵一般，回来了……¹⁹

原是堕胎医师的黄月媚因身份遭到未婚夫的抛弃，悲痛之余辗转来到香港靠售卖婴尸饺子获得香港身份证。她就像是幽灵一样游

17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第 236 页。

18 李碧华：《饺子》，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126 页。

19 李碧华：《饺子》，第 129 页。

离在生死边缘，展现与生死纠葛的邪祟阴气，让人感受到没来由的恐怖和压迫感。

除了无形的“诡异”，李碧华的鬼魅小说更有丰富的有形形态。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鬼魂角色便是《胭脂扣》的如花。“作为鬼魂的如花虽然只是一个沟通古今、虚实、生死的线索性人物，却因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刻文化内涵和现实政治隐喻。”²⁰ 她所代表的是见证了英殖民时代的旧人，因等不到来地府报到的情人十二少而重返人间。她的灵魂不断游走在物是人非的场景，企图以走场的方式向代表新时代的袁永定展示香港的旧面貌。这种以灵魂重构历史的书写，不仅仅在缅怀旧香港，同时也在感叹着时间不可逆，体现香港人的精神无所依归而产生的焦虑和无奈。此外，李碧华小说中还塑造了其他具有形态的鬼魅，其中包括：

《未经预约》：

“（何慧欣）才刚刚开始工作，连男朋友也未有。”
甚至没有“明天”。²¹

《新租客、旧租客》：

她（陈少玲）仍是一个勤奋的地产经纪，她仍把客人带上去看楼——客人都已经离开人世，但恋念故居，非要上来一住。

他/她们的“租约”已满，但心有不甘，或心有挂碍。²²

《树王》：

“那你知道香港第一间舞厅唤什么？”容伯睨向他。

“难道你上过去？”失业三年的大飞抢着问。

“别管。”容伯微笑：“‘银月舞院’开设于大道中路祐行楼上，老板姓叶，是华侨。”²³

20 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43页。

21 李碧华：《未经预约》，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第7页。

22 李碧华：《新租客、旧租客》，收录于李碧华：《冷月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第223-224页。

23 李碧华：《树王》，收录于李碧华：《枕妖》，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第162页。

这些形态各异的鬼魂都是李碧华小说中的创作主体。李碧华强调了鬼魂与时空之间的关联，仿佛拥有无尽的时间和穿梭的自由，尽力复述往昔或抒发失落。李碧华通过鬼魂的叙事来寄托“生于香港、死于香港”的深厚眷恋，也呈现了香港人所能共情的集体回忆。然而，这些依恋人世、未了俗缘的鬼魂，也将随着 99 年租约的到期，面临历史的断层。透过鬼魂之口，她指出九七的到来让香港人民对于未来充满焦虑。比如《树王》中李碧华拟人化两百岁树龄的容伯回忆了殖民政府的自由文化，并在言辞中因自己见过的世面比其他树来得多而深感自豪。然而，结尾树王最后却以死亡苍凉收场，似在感慨香港所有的回忆即将消散。

在《离奇》一书的序《中国鬼片十大润滑剂》中，收录了李碧华与制片人提到中国对于灵异或迷信题材很是禁忌的事。李碧华提到自己大胆描写鬼魂不光是因为这是商业最受欢迎的题材，也是一种挑战当代中国的禁忌的傲骨表现：

有一回我笑道：“1949 年建国后中国没有鬼？那么我写 1948 年的鬼总可以吧？”

“不行！”制片人马上回应：“1947 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中央已定 1921 年 7 月 1 日为建党日。”

“哦，那么写 1920 年的鬼没问题吧？清末民初也有不少冤魂呀。”

“你别闹了，什么年代的鬼也不行！”²⁴

《孔子·先进第十一》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²⁵。被否定的迷信和鬼怪题材，却给了李碧华笔下亡魂尽言所不能之事。比如在《赃物》中讲述被鬼缠身的精神失常失业汉关富强的故事。他住在香港极具特色的棺材房，面对着不断加价的日常用品，以至于最后仰赖偷骨灰变现过活。小说中不断重复香港地窄人稠，强调人鬼殊途同归的状态：

24 李碧华：《离奇》，第 6 页。

25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449 页。

生为一个位，死也为一个位。

他们基本上“有位”！

前面是什么？这一刻没想过，虽然很快乐，但“前途茫然”，有一点惆怅……人和鬼，都在找一个归宿。²⁶

在李碧华在小说借亡灵之口强化香港土地问题，谩骂世界不公平导致人们生活颠沛流离，即使是做鬼也必须如同生前一样苟延残喘。在这个金钱利益至上的地方，背后承载着外来者太多、机会不平等的寓意。她并未将社会问题以人的形象直接控诉社会，而是通过虚构的、神秘的故事情节，让读者在不自觉中开始合理化小说中虚构的元素。薛慧娜在其硕士论文《论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鬼话”叙事》中点名李碧华的鬼魅小说的独特之处：

港台文学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完形鬼话，完形鬼话的突出特点是不仅作家本人充分浸入鬼话，而且有意愿的让作品完全占领读者和观者的意识，让鬼话彻底显现。²⁷

这些鬼话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连结香港都市的社会现象与经验，通过鬼怪之口将不满一并倾出。她将镜头锁定在香港空间，探究在漫长的香港历史之中人心和鬼魅并没有太大差别，有时候人的行为比鬼来得更可怕。比如在《面膜妖》里讲述了一个贪图免费赠品而烂脸的女子，为了能够治好自己的烂脸，她只能不断地寻找下一个冤大头转移自己的伤痛。

与此同时，李碧华在小说中毫不避讳地书写死亡。在她的小说中界定九七就是香港的大限，而在这个有限的日子里，她的作品中展现了哲学家马丁·海格尔对死亡的态度：“把死存在标识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汲汲求取一种可能事物，亦即为使其实现而操劳”²⁸这种向死而生的心态，是将死亡当成是日常会发生的一种可能性，从而让生命变得有意义。

26 李碧华：《离奇》，第42-43页。

27 薛慧娜：《论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鬼话”叙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0年，第5页。

28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24页。

《喜材》中就讲述了一个老教师米永祥买好棺材等待自己死亡，却一直死不去。于是，他频频借棺材给其他亡者，作为交换村长答应能为他免费加厚棺木。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大火却将原本加厚的部分全部烧毁，留下最原始的棺材厚度。从这件事他领悟到，在剩余的大限里应该好好过日子，并非毫无意义地干等死亡降临：

“‘知足’原来也是一种福气。”²⁹

在《生死桥》中，李碧华在开篇便给三位主角定下了他们的结局——“生不如死，死不如生，先死后生”³⁰。在命运的摆布下，三位主角一步步走进了李碧华所设定的圈套里，蕴含着九七历史发展也如同因缘已定，只得乖乖就范。

李碧华的鬼魅和死亡叙事中，无不将悲剧的矛头指向即将到来的大限。她笔下的鬼魂表现对现实的眷恋和不舍，感叹时间不等人物的话语。然而不管怎样，李碧华的小说中明显看出不管是亡魂还是活人的命运都是本同末离，逃不出已经注定的命运。因此，她提出知足、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或许是缓解眼下焦虑的最佳办法。

四、史料与纪实

在《中华秩序》里面提到：“历史持续而永恒地记录、批判、奖惩人们的行为，解释过去，并赋予生命永恒意义。”³¹李碧华大部分小说依附现实、记载清晰的历史脉络来进行创作，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图使得读者对作品有更深沉的代入感。虽然其中仍旧有夸张、荒谬怪诞的部分，但细致的逻辑和情理会让读者有所联想、深思。

首先，她在小说中经常纪实地书写香港，就像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怀旧与悼念即将面目全非的地方。不过，她笔下的香港并不总是完美的，对曾经发生过的六七暴动“土制菠萝”³²和香港人情冷暖

29 李碧华：《喜材》，香港：天地图书，2012年，第38页。

30 李碧华：《生死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31 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9年，第45页。

32 李碧华：《寻找蛋挞——吃蛋挞的女人》，《饺子》，第63页。

“即使喊救命，也少管闲事充耳不闻”³³毫不避讳地将香港缺点袒露在读者面前。黄美瑟在其论文《李碧华小说之艺术研究》中认为：

李碧华的高明之处在于从“历史的断裂、失意处”入手，采用古今融合时空穿梭之法，借助于读者熟悉的传奇故事模式，以现代都市的沈是眼光作反观的意象，造成失熟悉与陌生的张力。³⁴

这样的创作让读者较易抽离现实，从她所描写的历史中获得启发。然而，李碧华书写的小说历史牵涉并不局限于香港本土，以虚实结合的方式自由穿梭于中国当代历史的不同事件。

李碧华专门出版了记录天安门事件小说——《天安门旧魄新魂》，以第一视角代入学运份子的角色。在小说中，她书写天安门事件学生们的示威，然而政府却以暴乱之名将学生一网打尽。小说中从原本以为军方是友“解放军也真好，明白了，也保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³⁵到最后成为解放军屠杀的亡魂而发出：“我们不要回中国。”³⁶的悲鸣。

李碧华在小说中附录天安门事件民众流血受伤的照片以示证据，也揭露政府事后极力想挽回形象：“解放军形象一落千丈，利用空闲去骑马、企图改善、减轻市民恨意。”³⁷以及让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全面崩塌的检举文化：“他们（亲戚）检举了‘反革命分子’才可避却株连。他们若不举报，邻居也会举报。”³⁸李碧华在小说中书写天安门，这是因为80年代天安门事件后，中国的人权自由和形象曾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而天安门事件距离香港九七不到十年，大陆爆发的大事纪和动态也使香港人民成为惊弓之鸟。

33 李碧华：《黑伞》，《喜材》，第230页。

34 黄美瑟：《李碧华小说之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华大学，2015年，第42页。

35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第68页。

36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第146页。

37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第160页。

38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第104页。

大陆的封闭和香港的开放形象，在九七前形成鲜明的对比。李碧华的《青蛇》、《霸王别姬》、《饺子》、《垃圾堆中的红袍》、《黑天鹅孽恋》中都提到改革失败、文革吃人的恐怖，这无疑反映了港人的忧虑。《胭脂扣》中，她有意安排死了 50 年的如花回到香港会会袁永定。一人一鬼交谈，不管是经历和时间的维度都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区别和代沟：

“我在哪里？”她几乎要哭出声来，“这真是石塘咀吗？”

她开始认路：

“水坑呢？我附近的大寨呢？怎么不见了欢得、咏乐？还有，富丽堂皇的金陵酒家、广州酒家呢？……连陶园打八音的锣鼓乐声也听不到了——”她就像歧路亡羊。³⁹

如花因周围的建筑早已物是人非感到诧异，然而两人的代沟不
仅仅是建筑的变化，而且还有生活，比如教育的推行：

“什么是会考？”

“那是一群读了五年中学的年青人，一齐考一个试，以纸笔作战争取佳绩。”

“不会考可以吗？”⁴⁰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袁永定和如花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个体。虽然他们经历过英殖香港时期，但五十年变化太多使他们陷入文化差异的尴尬之中。就像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强调真历史的现代性和实用性即是当代史：

当我所处的历史的文化发展向我提出有关希腊文明或柏拉图哲学或某种阿提卡活动习惯的问题时，那个问题跟我的生活的关系……跟我的关系是一样的。我用同

39 李碧华：《胭脂扣》，《胭脂扣》，第 18 页。

40 李碧华：《胭脂扣》，《胭脂扣》，第 14-15 页。

样的焦虑去考察它，我同样感到不快，直到把它解决为止。在这种情况下，希腊生活对我就是当前的。⁴¹

于是，李碧华在小说中构建对香港社会未来的想象。其中，她对“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有这样的诠释：

“让我们虚伪地欺骗自己吧，大家供应甜言蜜语，故意看不见危机，五十年不变。”

“你知道什么是五十年不变？”

“我猜，”牡丹侧起了头：“——十年内尽量的变，变到差不多了，接着下来的五十年就不变了。”⁴²

李碧华借香港画家和洛阳牡丹的对话，讨论彼此的遭遇、殊途同归的焦虑感。“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似也透露出作者李碧华对此的想法。

五、结论

李碧华小说中的九七焦虑书写，主要以中国政治和当代社会来对比香港的状况。在故事新编中，她赋予经典小说人物新的意义来检视中国历史，也探讨了新移民在港的问题与留港心态。从她笔下所塑造的人物来看，角色大多数情侣皆爱而不得、悲欢离合、死亡收场，充斥着浓浓无力的惆怅感，深刻展现了香港人在九七前的焦虑。然而，李碧华的死亡叙事也塑造出万物皆与生死的宿命论，把九七设为大限才会在有限的时间内尽情享受最大的欢愉。

此外，李碧华在创作中也大量引用史料作为创作材料，揭露政治与社会问题，凸显了她的人文关怀。与此同时，李碧华小说在描写历史时并没有据理力争，更多的是将虚幻与现实融为一体。这种真假参半的创作方式也让读者能自由联想或思考，可谓还历史一个多面诠释的可能。

41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42 李碧华：《洛阳牡丹》，收录于李碧华：《幽寂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第100页。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戏弄古今：谈李碧华的〈青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和〈霸王别姬〉》，黄维梁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1999年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香港大学中亚书院，2000年。
2. 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3. 陈云：《香港大灵异》（二集），香港：花千树出版，2013年。
4. 韩宇瑄：《论李碧华小说的鬼魅书写及其文化源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 黄国钜：《从悲剧看香港的命运》，思想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本土与左右》，台北：联经出版，2014年。
6. 黄美瑟：《李碧华小说之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华大学，2015年。
7.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8. 李碧华：《天安门旧魄新魂》，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
9. 李碧华：《枕妖》，香港：天地图书，2008年。
10. 李碧华：《未经预约》，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11. 李碧华：《冷月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12. 李碧华：《幽寂夜》，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
13. 李碧华：《喜材》，香港：天地图书，2012年。
14. 李碧华：《青蛇》，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5. 李碧华：《霸王别姬》，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6. 李碧华：《胭脂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17. 李碧华：《离奇》，香港：天地图书，2013年。
18. 李碧华：《饺子》，香港：新星出版社，2013年。
19. 李碧华：《生死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20. 李碧华：《饺子》，香港：新星出版社，2013年。
21.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3.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
24. 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9年。
25. 薛慧娜：《论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鬼话”叙事》，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师范大学，2010年。

26. 郑宏泰、黄绍伦：《身份认同与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香港中文大学编：《二十一世纪评论》，2005年12月第92期。
27. 邹枝玲、程黎（译）：《焦虑症与恐惧手册》，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



语言习得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基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和中国南京 样本的跨文化研究

卢海宁、邓铸、庄瑜璐

摘要: 母语对个体的表征风格有一定的影响, 而语言之习得与环境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母语习得环境与文化背景对个体表征风格的影响及关系, 通过《客体-空间表象及言语》问卷, 共收集了中马两国 1177 名中学生的被试数据, 检测不同母语习得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中学生表征风格的发展状况差异。结果显示, 中国学生在表征风格三个维度上无显著差异, 马来西亚马来裔学生客体表象得分较低, 但言语表征得分较高。在母语同为中文的被试中, 中国学生各维度得分均高于马来西亚学生, 但马来西亚不同语言环境的被试之间各维度得分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说明母语差异影响个体表征风格。具体来说, 中文具有“表意”和“象形”等特性, 对个体表征风格的客体维度影响显著, 而作为“拼音文字”的马来文, 则对个体表征风格的言语维度影响显著。

关键词: 中学生, 语言习得环境, 表征风格, 跨文化研究

作者: 卢海宁,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研究兴趣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认知与神经科学。邮箱: lohhaining@gmail.com; 邓铸,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江苏省“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澳门城市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江苏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江苏省心理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邮箱: zdeng_psy@163.com; 庄瑜璐, 中国南京市第九中学, 中学一级教师, 研究兴趣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邮箱: 1114681992@qq.com。

Title: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on Styles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 Cross-Cultural Study Based on Samples from Kuala Lumpur, Malaysia, and Nanjing, China.

Abstract: Native languag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individuals' representational styles, with language acquisition closely linked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mpact of native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on representational style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177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and Malaysia using the "Object-Spatial Imagery and Verbal Questionnaire" to examine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representational styles across variou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presentational styles of Chinese students across the three dimensions. In contrast, Malay students in Malaysia exhibited lower object imagery scores but higher verbal representation scores. Among particip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was Chinese, students in China outperformed their Malaysian counterparts across all dimensions, thoug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among Malaysian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inguistic environme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native language influences representational styles,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ized by its ideographic and pictographic features, enhancing object-related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s, while the alphabetic Malay language primarily affects verbal dimension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representational style, cross-cultural study.

Author: Loh Hai Ning, Ph.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evelopmental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gnitive and neuroscience. Email: lohaining@gmail.com; Deng Zhu,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Jiangsu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and Cognitive Science," Adjunct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He also serve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Jiangsu Psychological Societ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eaching Work Committee of the Jiangsu Psychological Society. Email: zdeng_psy@163.com; Zhuang Yulu, Senior Teacher of Nanjing No. 9 High School,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mail: 1114681992@qq.com.

一、前言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且提倡多元文化的国家。根据 2024 年马来西亚统计局数据显示，其总人口约有 3400 万，其中分别有：土著（包含马来人及原住民）占约 70.1%，华裔占约 22.6%，印裔占 6.6%，其他民族占 0.7%。一直以来，国内各民族皆按照各自祖籍国的方式办学，如马来人开办的马来语或爪哇语宗教学校（伊斯兰教）、华人团体开办的华文学校或会馆学校（如潮州会馆、福建会馆、广东会馆）以及印度人开办的淡米尔文学校等等，由此形成了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教育制度，成就了如今马来西亚国内复杂却多元的教育体系，以及日常生活中多语混合的、复杂的语言环境。

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稳健及强大，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极大一波“中国风”，更是显示出在未来社会中掌握中文的重要性。因此，不管是基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还是基于在马来西亚国情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必要，或者是基于个人未来发展需求，完整的中文学习体系都该是马来西亚华社和未来课程教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如何能令马来西亚华社更加重视母语教育问题，并帮助大马华人在多元语言环境中更好地掌握母语，且多元文化及语言环境又会对新时代的大马华人造成什么影响，研究者希望能通过本研究得到解答。

另一方面，若从文字的特性出发，汉字显然是一种象形文字，是具有超语言交际功能的表意文字，而非单纯的语言符号。由于汉字兼具视觉和语音信息，其字形的视觉性有助于学习者构建更丰富的图像，因而影响使用者的表征风格。相比之下，马来语中许多借词（即外来词、借自外民族语言的词）源自于梵语和阿拉伯语，和英语一样使用拉丁字母，属拼音文字，侧重语音信息，是更纯粹的语言符号系统，对语言表征的发展更有利。近年，不同语言的习得策略愈发受到学界重视，其中以英语作为目的语（即译入语，如将 A 语言译成 B 语言，则 B 语言为目的语）的研究最多，其次是汉语，但后者的数量在近五年来有急剧增长的趋势。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以汉语和马来语两种语言为主要考察目标，以汉语和马来语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性质出发，探究在学习环境和文化背景差异下，母语习得对被试个体表征风格之形塑和影响。以下将对三者进行概括性的文献梳理。

（一）母语习得的概念及理论发展

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 又被译作“语言获得”，在语言学学习理论中指儿童习得自己母语的过程¹，是人类语言发展一个必然的过程，具体指在自然语言环境中通过具有沟通和学习意义的语言交际活动，在潜意识中培养出的一种语言习惯。从语言习得时间顺序上区分，主要分为一语习得（通常指母语）、二语习得、三语习得乃至多语习得，母语习得通常指儿童自然习得的第一种语言。语言习得主要是描述学习者如何获得语言，并解释学习者为什么能够获得语言而进行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语言习得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增多，其中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

Berman (1983) 将母语习得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前语法期 (Pregrammatical)、语言知识语法化 (Grammaticization) 和用法习得 (Usage)²。儿童从一开始依赖非言语信息来理解话语，慢慢学会利用构词规则扩大自己词汇量并学会组词造句，经由尚未完全掌握好语法的过度概括 (Overgeneralization) 过渡阶段，发展至最后掌握语言约定俗成的用法和规则，且熟练掌握该语语法结构和用法达到自动化程度 (Automaticized)，才算是完全习得了母语。

一般而言，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分属不同机制。母语习得是一种“习得 (Acquisition)”环境，而二语习得则是“学得 (Learning)”环境³。母语习得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18 世纪末，然而在 20 世纪 40 至 50 年代起，人们才开始系统分析儿童母语习得特点和他们的语言形式，尝试找出人类能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语言这一复杂交际系统的规律，研究者们由此发展出不同的母语习得流派理论，如先天论、行为主义论和认知论。

1. 先天论：Chomsky 认为人类先天具备语言习得机制

1 李晓丽：《母语习得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第 138-140 页。

2 Berman, R. A.. On the Study of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Vol.33(5), 1983, pp. 221-245.

3 Krashen, S.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Language Acquired Device, LAD), 以及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 UG), 这为儿童的语言习得提供了生物学基础⁴。

2. 行为主义论: 此学派认为, 语言行为是由刺激与反应所构成, 是依靠外部环境条件反复培养而成的习惯⁵。语言输入和使用对习得至关重要, 语言习得离不开外部的习得环境, 亦有不少实证研究肯定了课外语言环境对语言习得的影响作用⁶。

3. 认知论⁷: 皮亚杰认为, 儿童语言发展过程同步于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包括思想表达和沟通需求。语言习得为环境主导之果, 作为文化载体, 不同文化背景会影响语言习得的效果。

总体而言, 有关语言习得理论的特点有: 语言习得具先天性构式语法结构, 受外部条件刺激以及后天环境影响。而学习者能够使用语言, 其实是学习者内部语言机制对语言环境信息输入的作用, 是语言系统内在化的自然结果⁸。母语习得和二语或三语习得, 无论是从方法还是概念上都存在着差异。若以母语习得方式学习二语, 结果会事倍功半。相反地, 如果以二语习得方式学习母语, 对个体语言和认知发展相信都会有所影响。

(二) 语言环境的概念划分

在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中, 一般将个体正要学习的语言称为“目的语”, 而学习语言的环境则在此基础上划分为“目的语环境”及“非目的语环境”。例如, 一个人在中国学习英语, 则英语为该个体之“目的语”, 而中国是外语环境, 也就是“非目的语环境”, 则该个体在“非目的语环境”中学习“目的语”。近年来, 由于掀起了“中国热”潮流, 越来越多人开始学习汉语, 也因此有

4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Syntactic Structures. German: Mouton & Co. 1957, pp.18-25.

5 Krashen, S.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pp.52-74.

6 可参考王天星(2002)、李玉军(2006)、陈晓桦(2007)、仇鑫奕(2010)研究, 见参考文献第1、2、9、13条目。

7 Piaget, J.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Cook, Tra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52. pp.25-29.

8 王初明: 《应用心理语言学——外语学习心理研究》, 湖南: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第14-33页。

关于对外汉语以及相关汉语学习的研究也与日俱增。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环境被划分为课堂语言环境和自然语言环境⁹。

对于学习目的语的语言环境，是在目的语环境还是在非目的语环境中较具有优势，目前的研究中仍是众说纷纭。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在目的语环境中进行目的语学习比较有利，因为除了课堂学习任务以外，生活环境中的用语压力也能成为学习者学习语言的动力。一般人们也都认为，在目的语环境中学习目的语更加“道地”。但亦有研究对此进行了反驳，黄金宝通过一项对越南籍汉语学习者进行的研究，表示越南汉语学习者在自己的母语环境下学习汉语，将比在汉语环境下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得到更规范、更标准、更透彻的信息输入¹⁰。然而，张紫薇的研究中，英语学习者在汉语环境下学习英语，容易对学习过程产生负面影响。但作者也提出，其中大概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文化等因素对学生思维习惯和学习方式进行干扰¹¹。因此，目前尚无法确定在目的语环境或母语环境中学习目的语哪种更具优势。另外，目的语的性质也可能是影响因素。

（三）表征风格的内涵及理论发展

表征（Representation），在认知心理学定义中指信息呈现在大脑中的形式¹²。在信息加工理论中，有机体都是以表征模式在大脑中操作，对外界信息进行输入、编码、储存和提取。而个体在对信息进行表征时所倾向或惯用的方式则被称为表征风格，是认知风格重要组成成分，更被认为是认知系统在获取外界信息时的中介状态¹³。表征风格理论经历了从二维到三维的发展过程。

9 赵娜：《论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同语言环境对学习者的语言发展的影响》，《大众文艺》，2018年第6期，第236-237页。

10 黄金宝：《论非目的语环境下语言环境对汉语学习的影响》，《现代语文》，2015年第12期，第111-113页。

11 张紫薇：《汉语语言环境对学生英语学习过程的影响》，《农家参谋》，2017年第14期，第164-165页。

12 Qin, Y., & Simon, H. A.. *Imagery and Mental Models in Problem Solving*. Pittsburgh, P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1992.

13 Markman, A. B., & Dietrich, E.. In *Defense of Representa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40(2), 2000, pp.138-171.

早期的言语-表象二维理论（即双重编码理论 Dual Code Theory, DCT），简单地将个体表征风格区分为偏向使用言语或表象两种方式¹⁴。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提出了包括空间表象和客体表象在内的三维理论，更准确地描述了个体在处理视空信息时的差异¹⁵。从神经科学研究可以看出，表象系统具有客体和空间两个子系统，分别与颞叶和顶叶皮层相关¹⁶。表征风格的这一发展揭示了个体在思维方式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四）认知风格差异下的语言习得

在语言习得领域中，已有不少学者引入了认知风格这一因素对其进行研究。比如有大量实证研究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场独立型认知风格更有利于二语学习，比如场独立型语言个体的语言成绩¹⁷、场独立与诸如写作之类的某项语言任务相关¹⁸、场独立与完形填空测试成绩高度相关¹⁹、场独立与语言测试整体成绩相关²⁰。

亦有研究表明，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同属于智能差异和学习风格范畴，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水平差异，只存在类型差异，具体表现为年龄与性别差异。如：在思维品质上，场独立性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场依存性则与年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青春期后，女性也较男性更偏向于场依存性。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女性更偏好使用鼓

14 Paivio, A..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 Dual Coding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Psychology, 1986, pp.53-84.

15 Kozhevnikov, M., Hegarty, M., & Mayer, R. E.. Revising the Visualizer-verbalizer Dimension: Evidence for Two Types of Visualizers.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Vol.20(1), 2002, pp.47-77.

16 Mazard, A., Mazoyer, N. T., Crivello, F., Mazoyer, B., & Mellet, E.. A PET Meta-analysis of Object and Spatial Mental Imagery.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16(5), 2004, pp.673-695.

17 Tucker, G. R., & Lambert, W. E.. Field independence-dependence and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TESOL Quarterly*, Vol.10(3), 1976, pp.307-317.

18 可参考 Abraham (1976), (1985)、Chapelle (1986)、Naiman (1978) 研究，见参考文献第 22、26、39 条目。

19 Hansen, L.. Field Dependence-Independence and Language Testing: Evidence from Six Pacific Island Cultures. *TESOL Quarterly*, Vol.18(2), 1984, pp.311-324.

20 可参考 Chapelle (1986)、Jamieson (1992)、吴一安和刘润清 (1993) 研究，见参考文献第 26、31、14 条目。

励对方进行回答的言语方式，因此在参与交际上女性较男性更为积极。

(五) 汉字的性质与汉字识别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髓。它将“声”与“意”、“形”与“音”完美结合，展现了视觉符号和语音符号的有机统一。汉字识别是指“从汉字的视觉刺激开始，经由一系列信息加工而获得汉字特征整合的认知历程”²¹。这包括对字音、字义、字形三方面的加工，但以字形识别最为关键。研究发现，在提取字义时，字形的作用大于字音。从对汉字字音、字义、字形的激活时间研究来看，字形识别最先得到处理。汉字字形是一种视觉表象刺激，因此汉字识别也就是构成、储存和提取汉字字形视觉表象的过程²²。由于汉字字形的唯一性，它在辨识字义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20 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汉字性质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观点存在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 表意文字说

索绪尔²³等人认为，汉字根据语义构型而成，是同时保有图画和语音成分的表意文字，一个符号直接对应一个词义概念。

2. 表音文字说

姚孝遂²⁴、郭沫若²⁵等人则主张，汉字通过语音来表达概念，每个符号都有读音对应，已经发展成纯粹的表音文字。

21 何玲：《儿童和成人汉字识别的眼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第2页。

22 黄才英：《认知风格对东南亚留学生汉字识别的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第9页。

2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6-63页。

24 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1980年第4版，第7-39页。

25 郭沫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5日，第3版，第21页。

3. 表词文字说

布隆菲尔德²⁶、王伯熙²⁷人提出，汉字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特征，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词，因此应称为表词文字。

4. 词素（语素）文字说

赵元任²⁸、伊斯特林²⁹等人认为，汉字是以词素或语素为单位的文字类型。

除此之外，还有意音文字说、形音文字说、音节语素文字说、意符音符文字说、图画表音形音文字说等不同观点，各成一派。

纵观上述诸说，均着眼于汉字的不同侧面，反映了汉字独特存在的复合特征。汉字兼具表音和表意功能，同时具有视觉和语音两种表征形式，这种独特性决定了识别汉字需要整合视觉、语音、语义等多种认知加工，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识别拼音文字如英语和马来语的认知加工过程则相对更侧重语音编码。这种加工机制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使用不同语言的个体在表征风格上的偏好。长期使用汉语的个体，可能在视觉表象和空间表象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而使用英语、马来语等拼音文字的个体，则可能在言语表征加工上更具优势。

以马来西亚为例，这个多元文化国家的常用语包括汉语、英语和马来语三种常用语，且分别在独立中学和国立中学这两种不同教育体制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使用。独中强调“三文三语”教育，汉语是主要教学媒介语；国中则以马来语和英语为主。在这种语言习得环境下，学生的母语使用频率和熟练程度显然存在差异，这可能对表征风格的发展产生影响。

另外，中学阶段普遍被认为是个体创造力、认知风格以及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³⁰，深入探讨汉语、马来语等不同语言系统的特性

26 袁家骅：《语言论》，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译，(L. Bloomfield, 1933)，第499-560页。

27 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兼与姚孝遂先生商榷》，《中国语文》，1984年，第2页。

28 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2-211页。

29 左少光：《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译，(B.A. 伊斯特林, 1960)，第62-101页。

30 胡卫平：《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力发展的课堂教学影响因素》，《教育理论与实

及其识别加工机制，有助于阐明语言习得对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揭示其中潜在的本质规律，为语言教育提供理论支持。

因此，为探究青少年在复杂多元的语言环境中表征风格之发展，本研究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和中国南京两国两地取得样本，探讨语言习得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目标有三：

1. 母语差异：比较以不同语言（汉语、马来语）为母语的中学生在表征风格发展上的差异；
2. 母语习得环境差异：考察马来西亚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独中、国中）将对华裔中学生表征风格造成何种影响；
3. 文化环境差异：探究语言学习环境（文化）差异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发放问卷进行集体测验，探究使用不同语言（汉语、马来语）在表征风格发展上是否有所差异，并进一步了解语言学习环境差异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一）测量工具

1. 中文版问卷

本研究所用问卷为《客体 - 空间表象和言语表征问卷》（Object-Spatial Imagery and Verbal Questionnaire, OSIVQ），该问卷由 Kozhevnikov 等人基于表征风格三维理论编制，包括客体表象、空间表象和言语表征三个子量表，每个子量表各 15 题，总共 45 题，采用 5 点自评量表评估被试的信息表征偏好。OSIVQ 中文版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良好，客体、空间和言语子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 0.83、0.83 和 0.97，重测信度为 0.75、0.84 和 0.73。已有研究表明该问卷具备良好的效标效度和区分效度³¹，是成熟的测评工具。

践》，2010 年第 8 期，第 46-49 页。

31 可参考 Marks (1973)、Ekstrom, French&Harman (1976) 研究，见参考文献第 37、28 条目。

2. 马来语版问卷及其信效度检验

基于马来西亚学情现状，笔者将中文版问卷翻译为马来语版本，在发放问卷进行正式测验前需完成相应的准备工作。

(1) 信度检验

在三次翻译和修订后，对马来文版问卷进行了两次试测，第一次样本为 118 名吉隆坡国中马来裔学生，第二次为 143 名学生。使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其客体表象、空间表象及言语子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接近或大于 0.70，信度良好（表 2-1）。因此，最终确定第四版问卷用于正式测试。

表 2-1: 表征风格马来文问卷信度分析

	项目数	Cronbach's Alpha
客体表象	15	0.803
空间表象	15	0.685
言语表征	15	0.709

(2) 效度检验

(i) 探索性因子分析

使用 SPSS 对 143 名样本进行因子分析，KMO 值为 0.690，Bartlett 球形度检验显示 $\chi^2=2213.561$ ， $df=990$ ， $p<0.001$ ，表明样本适合因子分析（见表 2-2）。碎石图显示问卷可提取 3 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为 31.651%。

表 2-2: 表征风格马来文问卷 KMO 与 Bartlet 检验

KMO (Kaiser-Meyer-Olkin)	Bartlet 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df	Sig.
0.690	2213.561	990	0.000***

注：* $p<0.05$ ，** $p<0.01$ ，*** $p<0.001$ 。

(ii)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验证马来文版问卷与原中文版问卷的理论一致性，采用 Mplus Editor7 对吉隆坡两所国中的 283 份有效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有效回收率为 80.86%。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较为

理想, $X^2/df = 1.550$, $RMSEA = 0.044$, 符合模型拟合标准 (见表 2-3)。验证表明该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稳定性, 283 名被试样本后续将作为 B 组被试投入正式实证研究中使用。

表 2-3: 表征风格马来文版问卷拟合指标 (N=283)

<i>df</i>	X^2	X^2/df	<i>RMSEA</i>	<i>CFI</i>	<i>TLI</i>	<i>SRMR</i>
942	1460.464	1.550	0.044	0.605	0.585	0.065

(二) 被试

研究将被试划分为 ABCD 四个组别, 分组依据及各组特点如下表所示 (表 2-4)。

表 2-4: 被试组别分类图

组别	国籍	母语	课堂语言 习得环境	自然语言习得环 境 (文化环境)
A 组 (汉族)	中国	汉语	汉语	汉语
B 组 (马来裔)	马来西亚	马来语	马来语	马来语
C 组 (华裔)	马来西亚	汉语	汉语	马来语
D 组 (华裔)	马来西亚	汉语	马来语	马来语

研究取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初一、初二及高一年级在籍学生为被试, 选择此三个年级作为取样对象原因有三: 第一, 中学时期为个体认知风格及能力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 第二, 在马来西亚教育制度下, 中学是华裔学生选择接受完整母语教育系统与否的转折或分化点, 对中学生认知风格及能力造成一定影响; 第三, 这三个年级为非应对大考的年级生, 有利于研究者获取校方允许和配合进行施测。

问卷测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填答时间不受限制。据事后统计, 被试问卷填答用时在 15-20 分钟之间。研究共计发放 1400 份问卷, 回收并剔除无效个案后, 得到有效数据 1177 份, 有效问卷

回收率达到 84.07%。

表 2-5: 整体被试构成

组别	性别	初一	初二	高一	总计
A 组	男	60	59	57	349
	女	60	63	50	
B 组	男	64	45	49	283
	女	23	66	36	
C 组	男	36	43	29	259
	女	47	51	53	
D 组	男	41	51	55	286
	女	46	38	55	

(三) 研究方案

本研究以母语（中文、马来文）、课堂语言习得环境（与母语差异小、差异大）和自然语言习得环境（文化背景：与母语一致、不一致）作为主要考察目标，以年级（初一、初二、高一）和性别（男、女）作为自变量，表征风格的三个维度（客体表象、空间表象、言语表征）为因变量，一共划分出三个子研究。具体设计如下：

研究一：比较在母语习得环境与文化背景一致的情况下，不同母语（中文、马来文）中学生之间在表征风格上的差异（A/B组）；

研究二：比较在课堂母语习得环境差异大小不同的情况下，不同课堂语言习得环境（马来西亚独中生、国中生）中学生之间的表征风格差异（C/D组）；

研究三：比较在母语相同而文化背景不同的情况下，中国学生和马来西亚独中生之间的表征风格差异（A/C组）。

三、研究分析

(一) 研究一：母语差异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1. 研究假设

本节以汉字所拥有的独特性质为出发点，对比分别以中文和马

来文两种语言为母语的中学生，在各自土生土长的环境条件下，也就是不同母语个体在文化背景和母语习得环境一致的情况下，其表征风格的差异。研究假设为：以表意文字 - 中文为母语的中学生（A组），其表征风格的客体表象倾向会略高于以拼音文字 - 马来文为母语的中学生（B组），而在言语表征倾向上则会略低于后者。

2. 数据分析

由表 3-1 可知，A 组中国汉族学生与 B 组马来西亚马来族学生在表征风格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其中，客体表象维度（ $F=151.571$, $\eta^2=0.196$ ）与言语表征维度（ $F=8.057$, $\eta^2=0.013$ ）差异显著。结果显示，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学生在客体表象维度上的得分较以马来文为母语的中学生高（ $MD=7.86$ ），而在言语表征维度上的得分则较后者低（ $MD=1.68$ ）。这验证了母语差异会影响表征风格的假设。

表 3-1: 不同母语背景下中学生在表征风格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M±SD; N=632)

	母语		F	p	η^2
	中文 (A 组)	马来文 (B 组)			
客体表象	57.62 ± 8.384	49.76 ± 7.712	151.571	0.000***	0.196
空间表象	46.08 ± 8.954	45.11 ± 6.909	1.210	0.127	0.002
言语表征	44.19 ± 8.243	45.87 ± 6.277	8.057	0.004**	0.013

以组别、性别和年级作为自变量，以表征风格问卷三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以及事后多重比较，得出唯客体表象维度 Levene F 检验结果 $p=0.643>0.05$ ，方差齐性假设成立。结果显示，在表征风格三个维度上，组别、性别与年级三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p>0.05$ ），除了言语表征维度，其余维度分别在组别与年级、组别与性别的交互上有着显著差异。

在客体表象维度上，组别与年级的交互效应显著， $F(2, 619)=12.033$, $p<0.001$, $\eta^2=0.037$ 。经简单效应检验，发现不论哪个年级，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学生在客体表象维度上的表现都显著高于同年级以马来文为母语的中学生（ MD 初一 =11.924, MD 初二 =4.440,

MD 高一 =7.504, $p<0.001$)。

在空间表象维度上, 组别与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 $F(1, 618) = 12.471, p<0.001, \eta^2=0.020$ 。对结果进行更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 以中文为母语的男生较以马来文为母语的男生有着更高的空间表象维度得分 ($MD=2.956, p=0.001$), 而女生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3. 研究结论

在母语差异上, 以表意文字 - 中文为母语的中学生 (A 组) 在客体表象倾向上显著高于以拼音文字 - 马来文为母语的中学生 (B 组), 且在言语表征倾向上略低于后者, 原假设得到验证——即母语差异在表征风格的形塑和发展表现上存在差距。

(二) 研究二: 母语习得环境差异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1. 研究假设

本节以马来西亚两种教育制度——国中 (非汉语环境) 及独中 (汉语环境) 之间语言习得环境差异为出发点, 探讨以中文为母语的马来西亚华裔学生, 在有着相同母语以及处在相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不同的课堂语言习得环境会对他们个别表征风格发展造成何种影响。本节研究假设在课堂语言习得环境差异方面, 环境条件差异小的独中生 (C 组), 在客体表象上的得分会略高于国中生 (D 组), 而在言语维度上的得分会略低于后者。

2. 数据分析

由表 3-2 可知在语言环境差异小 (C 组) 与语言环境差异大 (D 组) 的条件下学习母语之中学生在表征风格三个维度上的差异。C 组学生在三个维度上的个体间差异平均在标准差值 8 左右, 而 D 组学生在客体表象维度上个体间差异最大, 空间表象维度次之, 在言语维度上差异最小。其中, 唯有空间表象维度显示为边缘显著 ($F=3.254, p=0.072, \eta^2=0.006$)。经比较可以发现, 在语言习得环境大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国中生, 空间表象维度得分普遍高于语言环境差异小的独中生 ($MD=1.71$)。

**表 3-2: 不同语言习得环境的中学生在表征风格上的差异检验
(M±SD; N=545)**

	语言习得环境		F	p	η^2
	差异小 (C 组)	差异大 (D 组)			
客体表象	51.64 ± 8.187	51.87 ± 8.194	0.100	0.752	0.000
空间表象	40.94 ± 8.475	42.65 ± 7.520	3.254	0.072	0.006
言语表征	43.43 ± 8.607	44.40 ± 7.277	1.825	0.177	0.003

3. 研究结论

在课堂母语习得环境差异上, 马来西亚多语环境并未对 C 组和 D 组被试学生表征风格的三个维度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无法支持原假设。推测可能为被试样本采集存漏洞, D 组国中生大多都选修了中文课且日常用语也多为中文, 因此与 C 组独中生有着相近的母语习得环境条件。

(三) 研究三: 文化环境差异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1. 研究假设

本节以中国 (纯母语环境) 及马来西亚 (多语环境) 之间的自然语言习得环境, 也就是文化环境背景差异作为切入点, 探讨同样以中文为母语的国中生, 在有着相同的课堂语言习得环境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在表征风格发展上会有何种差异。两组被试母语均为汉语, 语言习得环境与母语一致, 唯马来西亚独中被试学生因国情现实等状况身处多种日常用语的文化环境。本节所做出的研究假设为: 在母语和文化背景一致的条件下, 中国学生 (A 组) 在客体表象维度上得分较高; 而在母语和文化背景不一致的条件下, 马来西亚独中生 (C 组) 在言语维度上得分会更高。

2. 数据分析

由表 3-3 可知, 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国中生 (A 组) 和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不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马来西亚独中生 (C 组), 二者在表征风格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其中, 客体表象维度 ($F=81.866$, $p<0.001$, $\eta^2=0.121$) 和空间表象维度 ($F=45.730$, $p<0.001$, $\eta^2=0.071$) 都呈现显著差异。经比较可以发现, A 组学生在客体表象和空间表象两个维度的得分上皆普遍高于 C 组学生 ($MD_{\text{客体}}=5.98$, $MD_{\text{空间}}=5.14$)。

**表 3-3: A 组与 C 组中学生在表征风格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
(M±SD; N=608)**

	母语与文化背景		F	p	η^2
	一致 (A 组)	不一致 (C 组)			
客体表象	57.62 ± 8.384	51.64 ± 8.187	81.866	0.000***	0.121
空间表象	46.08 ± 8.954	40.94 ± 8.475	45.730	0.000***	0.071
言语表征	44.19 ± 8.243	43.43 ± 8.607	1.305	0.254	0.002

以组别 (A、C 组)、性别 (男、女) 和年级 (初一、初二、高一) 作为自变量, 以表征风格问卷三个维度上的得分为因变量, 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以及事后多重比较, 发现在客体表象维度上 (见表 3-4), 组别与年级的交互效应显著, $F(2, 595) = 6.956$, $p = 0.001$, $\eta^2 = 0.023$ 。经简单效应检验可得知, 不论年级高低, 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中国中学生, 其客体表象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不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同年马来西亚独中生 (MD 初一 = 8.261, MD 初二 = 2.477, MD 高一 = 7.450, $p < 0.05$)。

另外, 组别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呈边缘显著结果, $F(1, 594) = 3.499$, $p = 0.062$, $\eta^2 = 0.006$ 。对结果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发现不论男女, 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中国中学生, 其客体表象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不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同年马来西亚独中生 (MD 男 = 7.423, MD 女 = 4.684, $p = 0.000$)。

表 3-4: 不同组别、性别和年级在客体表象维度上的差异分析

变异来源	平方和	df	均方	F	p	η^2
组别	5416.233	1	5416.233	81.866	0.000***	0.121
性别	13.375	1	13.375	0.202	0.653	0.000
年级	498.339	2	249.169	3.766	0.024*	0.012
组别 * 性别	231.467	1	231.467	3.499	0.062	0.006
组别 * 年级	920.458	2	460.229	6.956	0.001***	0.023
性别 * 年级	195.996	2	97.998	1.481	0.228	0.005
组别 * 性别 * 年级	175.379	2	87.689	1.325	0.266	0.004

在空间表象和言语表征维度上, 交互效应均不显著。其中,

空间表象维度的组别和性别两者个别的主效应呈现显著结果 ($p < 0.001$)。

3.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 母语习得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将对中学生表征风格造成一定影响, A 组被试在表征风格的客体表象和空间表象两个维度上表现较 C 组被试更优, 且中国纯母语环境使 A 组被试学生有着最高的客体表象维度得分。研究结果部分支持原假设。

四、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学生和马来西亚学生的表征风格进行跨文化比较, 探讨了母语、课堂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 主要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一) 不同母语对中学生表征风格有不同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国学生在客体表象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以马来文为母语的马来西亚马来裔学生, 而后者在言语表征维度上的得分较前者略高。这验证了不同母语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具有不同影响的假设, 符合 Kozhevnikov 等人关于视觉加工与表征风格关系的理论³²。

中文作为表意文字, 具有意符结合的特点, 是同时保有图画和语音成分的文字, 本就蕴含丰富的视觉信息。在认知过程中, 这种视觉表征刺激有利于构成更丰富的客体表象, 因此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更擅长处理客体表象信息, 在客体表象维度得分更高。而马来文属拼音文字, 更侧重语音信息的编码, 对言语表征发展有利, 因此马来文母语者的言语表征得分较高。这些差异侧面反映了不同母语对大脑认知方式的影响。

需要留意的是, 尽管二者存在一定差异, 但两种母语群体在非对应维度上仍保持了较高水平, 不存在绝对劣势, 这表明母语对表

32 Blajenkova, O., Kozhevnikov, M., & Motes, M.. Object-spatial imagery: A new self-report imagery questionnair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2), 2006, pp.239-264.

征风格的影响具有倾向性而非绝对性。

（二）课堂语言习得环境的差异对表征风格影响不显著

研究对比了马来西亚独中生和国中生的表征风格发展情况。尽管二者的课堂语言习得环境存在差异，前者拥有更多母语习得资源，但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客体表象、空间表象和言语表征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在文化背景相同的情况下，课堂语言习得环境的差异并不能对学生表征风格产生显著影响。

结合马来西亚国情，相同语言文化背景的熏陶对学生的影响大于课堂语言习得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合理的。虽然基于马来西亚国家政策，国中生能接受的中文教育有限，但大多数国中生仍选择了修习中文课程，生活中也长期使用或接触中文。这弥补了课堂语言习得环境的不足，导致课堂环境的影响被弱化。另外，小学阶段的中文教育也可能为两组学生都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降低了课堂环境差异的影响。总体来看，文化环境比课堂环境对表征风格影响更深远。

（三）母语与文化环境一致有利于表征风格发展

研究对比了中国学生和马来西亚华裔学生的表征风格发展情况。结果发现，在母语与文化背景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中文）的中国学生，无论男女都在客体表象和空间表象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母语与文化背景不一致的马来西亚华裔学生。这证实了母语与文化背景的匹配对表征风格发展有积极作用。

马来西亚作为多元文化国家，虽然独中生接受的是中文教育，但日常生活仍需要使用马来语、英语等，长期处于多语环境。相比之下，中国学生的自然语言习得环境更为纯粹和一致，这种文化环境的差异导致了两组间表征能力的差距。一致的文化环境有助于巩固母语习得的效果，使学生的表征风格得以更好地发展。

母语习得需要语言环境的长期影响和文化熏陶，不能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毕竟个体语言发展是先天能力与后天客观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发展过程同步于其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包括思想表达和沟通需求³³。一个合适的文化环境能够强化课堂语言习得效果，让

33 Piaget, J..*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Cook, Trans.). New York:

学习更加深入。这也表明，语言能力的培养需要课堂语言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双向支持，两者缺一不可。

五、结论

总体而言，个体母语习得离不开早期外界环境的语言输入。已有学者对儿童群体进行研究，提出了母语习得关键期假设³⁴。这个理论将个体母语习得关键年龄界定在2岁到青春期之间，其后更有特殊案例如狼孩，甚至是饱受舆论的凯洛格《猿猴与儿童》研究，都证明了这个论述。相关领域学者认为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随之下降，但这一点至今仍无法用实证方式做进一步的验证。支持者 Penfield 和 Roberts (1959) 认为人类大脑在0-10岁期间保持着高可塑性，然而在青春期之后，大脑语言习得能力和可塑性都会逐渐消失³⁵。不论如何，这些都证明了母语习得离不开个体所接触的外界环境，包括语言习得环境，乃至文化环境。

本研究已从不同母语、不同语言习得环境以及不同文化背景这三个方面切入进行实证研究，在各组被试比较之后，得知在不同条件下母语习得对个体表征风格发展之影响：

(一) 不同母语对中学生表征风格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中文具有“表意”和“象形”等特性，对中学生表征风格的客体维度影响显著，而作为“拼音文字”的马来文，则对中学生表征风格的言语维度影响显著；

(二) 在文化环境相同的情况下，课堂语言习得环境的差异对中学生表征风格的影响不显著；

(三) 与母语相匹配的文化环境对中学生表征风格发展的影响显著，在母语与文化环境一致的条件下学习母语的初中生，在客体和空间表象维度上有着显著优势。

显然，母语习得对个体的影响无论是在表征风格的客体表象还

W.W. Norton & Co. 1952, pp.25-29.

34 Lenneberg, & Eric H..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Hospital Practice*, 2(12), 1967, pp.59-67.

35 Roberts, L.. *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242-244.

是空间表象上都很显著。相信此结果对于促进马来西亚国民在母语的学习上接受至少十二年的中小学母语教育，能起到一定的鼓励和肯定作用——特别是以中文为母语的马来西亚华裔学生。同时，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母语是汉语或马来语的差异的确会对个体表征风格造成一定影响，未来希望可以纳入更多的语言，或以二语习得、三语习得等角度切入，进行更广泛的比对，探讨语言与认知风格之间的关联性。更甚者，可进一步研究学习多种语言是否有助于锻炼个体各个水平上的认知风格，以及学习多种语言是否能帮助训练个体为解决问题而对自身认知类型进行的切换。

参考文献

1. 陈晓桦：《目的语环境中有效课外汉语学习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1期。
2. 仇鑫奕：《目的语环境优势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新思路》，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
3. 郭沫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955年10月25日，第3版。
4. 何玲：《儿童和成人汉字识别的眼动研究》(Doctoral dissertation, 浙江师范大学)，2009年。
5. 胡卫平：《中小学生学习创造力发展的课堂教学影响因素》，《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8期。
6. 黄才英：《认知风格对东南亚留学生汉字识别的影响研究》，(Doctoral dissertation, 福建师范大学)，2013年。
7. 黄金宝：《论非目的语环境下语言环境对汉语学习的影响》，《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年第12期。
8. 李晓丽：《母语习得理论的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9. 李玉军：《留学生课外语言实践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0. 沙宗元：《课外语言环境对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作用和影响》，《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1. 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兼与姚孝遂先生商榷》，《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

12. 王初明:《应用心理语言学——外语学习心理研究》,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13. 王天星:《目的语输入环境在语言习得中的影响作用》,《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03期。
14. 吴一安,刘润清:《中国英语本科生素质调查报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
15. 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1980年第4版。
16. 袁家骅:《语言论》,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译,(L. Bloomfield, 1933)。
17. 张紫薇:《汉语语言环境对学生英语学习过程的影响》,《农家参谋》,2017年第14期。
18. 赵娜:《论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同语言环境对学习者的语言发展的影响》,《大众文艺》,2018年第6期。
19. 赵元任:《语言问题》,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20. 庄瑜璐:《高中生科学创造力与表征风格对问题解决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2017年。
21. 左少光:《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译,(B.A. 伊斯特林,1960)。
22. Abraham, R. G. Field Independence-Dependence and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Tesol Quarterly*, 19(4), 1985.
23. Berman, R. A.. On the Study of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Learning*, Vol.33(5), 1983.
24. Blajenkova, O., Kozhevnikov, M., & Motes, M.. Object-spatial imagery: A new self-report imagery questionnair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2), 2006.
25. Blazhenkova, O., & Kozhevnikov, M.. The new object-spatial-verbal cognitive style model: Theory and measurement.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3(5), 2008.
26. Chapelle, C., & Roberts, C.. Ambiguity tolerance and field independence as predictors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Language Learning*, 36(1), 1986.
27. Chomsky, N.. *Syntactic Structures*. German: Mouton & Co. 1957.
28. Ekstrom, R. B.. *Kit of factor-referenced cognitive tests*. Princeton: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1976.
29. Hansen, L.. *Field Dependence-Independence and Language Testing: Evidence from Six Pacific Island Cultures*. *TESOL Quarterly*, Vol.18(2), 1984.

30. Hao, Y. C..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tones by tonal and non-tonal language speakers. *Journal of Phonetics*, 40(2), 2012.
31. Jamieson, J.. The cognitive styles of reflection/ impulsivity and field independence/dependence and ESL succes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6(4), 1992.
32. Kozhevnikov, M., Hegarty, M., & Mayer, R. E.. Revising the visualizer-verbalizer dimension: evidence for two types of visualizers.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20(1), 2002.
33. Kozhevnikov, M., Kosslyn, S., & Shephard, J.. Spatial versus object visualizers: A new characterization of visual cognitive style. *Memory & Cognition*, 33(4), 2005.
34. Krashen, S. 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2)
35. Lenneberg, & Eric H..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Hospital Practice*, 2(12), 1967.
36. Markman, A. B., & Dietrich, E.. In Defense of Representa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40(2), 2000.
37. Marks, D. F. Visual imagery differences in the recall of pictur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64(1), 1973.
38. Mazard, A., Mazoyer, N. T., Crivello, F., Mazoyer, B., & Mellet, E.. A PET Meta-analysis of Object and Spatial Mental Imagery. *D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16(5), 2004.
39. Naiman, N., Fröhlich, M., Todesco, A., & Stern, H.H.. *The Good Language Learner. Research in Education Series No. 7*. Toronto, ON: OISE Press, 1978.
40. Paivio, A., & Csapo, K.. Concrete image and verbal memory co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80(2, Pt.1), 1969.
41. Paivio, A..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 Dual Coding Approach*. Newyork: Oxford Psychology, 1986.
42. Parkinson, A., Mullally, A. A. P., & Redmond, J. A.. Test-retest reliability of Riding's cognitive styles analysis t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7(6), 2004.
43. Peterson, E. R., Deary, I. J., & Austin, E. J.. The reliability of Riding's Cognitive Style Analysis t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2003.
44. Piaget, J..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M. Cook, Tran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52).
45. Qin, Y., & Simon, H. A.. *Imagery and Mental Models in Problem Solving*.

- 102 Loh Hai Ning, Deng Zhu, Zhuang Yulu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on Styles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ittsburgh, P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1992.
46. Roberts, L.. *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47. Tucker, G. R., & Lambert, W. E.. Field independence-dependence and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TESOL Quarterly*, Vol.10(3), 1976.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新媒体运营 ——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

米芮仪、董希平

摘要: 本文研究了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和新媒体运营的现状, 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 对其基本内容进行了讨论。首先, 本文以湖南省博物馆为例, 对其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和新媒体运营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数字化博物馆方面, 本文探讨了湖南省博物馆以官网为战略基地的数字化博物馆在线等项目的建设情况和应用效果。在新媒体运营方面, 本文重点分析了湖南省博物馆在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上的运营策略和实践经验, 并对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分析, 为相关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 同时也为推进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和新媒体运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数字化、博物馆、新媒体、融合互动

作者: 米芮仪,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硕士, 研究方向为艺术管理学、文化传播学。邮箱: alleria_2023@qq.com;
董希平,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文学系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词学, 文创设计与写作。邮箱: dongxiping@hotmail.com。

Title: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useu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 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museum construction and new media operations at the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I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f the museum's online digital presence, with a focus on its official website as a strategic foundation. Additionall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museum's strategi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managing

new media platforms, particularly its WeChat public account. It also identifies and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issues currently faced in these areas.

Keywords: digital museum,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current situation thinking

Author: Mi Ruiyi,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from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rts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alleria_2023@qq.com; Dong Xiping,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poetry, cultural creative design and writing. E-mail: dongxiping@hotmail.com.

前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实基础——博物馆、博物院等机构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功用。2022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确立的“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¹。“让文物活起来”成为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课题。博物馆需要通过推进“互联网+博物馆”，利用数字化、网络化展示手段，将新技术与文化创意相结合，以此来讲好文物故事，扩博物馆的传播力、影响力。

来自国际博物馆协会的报告显示，2020年采用线上展示藏品、展览和直播的博物馆增加了约15%。数字技术和博物馆正产生着前所未有的联系。而湖南省博物馆早在2016年就提出了一个建设共有、共建、共享博物馆的战略规划，计划要在2020年之前完善博物馆的信息体系，把智慧博物馆的整体框架体系搭建成。²正

1 张静（编辑）：《文物活起来 推进文物数字化展示》，《中国文化报》，2023年。网址：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2023lh/9684/202303/t20230307_940283.htm。取用日期：2020年12月25日。

2 段晓明：《湖南省博物馆的智慧经验》，《龙华网直播文字》，2019年。网址：https://www.sohu.com/a/338250014_120066051。取用日期：2020年

是因为在这一特殊时期，探讨湖南省博物馆数字化与新媒体运用等基本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别意义。

新传媒产业联盟秘书长王斌定义新媒体为“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创新形态的媒体”。³新媒体指将除去传统媒体（纸媒、广播、电视等）以外的所有新兴的媒体。新媒体突破了单一传播主体的局限性，使博物馆展览由单向传播走向双向传播，传播力度和辐射范围有了本质的提升。近年来，各大博物馆逐渐在微信和微博等平台发展和完善其艺术传播的基本内容，以求不断拉近与公众的距离。

一、湖南省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

数字化博物馆是一种以数字技术及其资源为主要基础支撑的新的博物馆表现形态。它是可以脱离实体博物馆而存在的，是有别于实体博物馆的一种新的形态。⁴湖南省数字化博物馆的重要建设阵地主要集中在官方网站和 APP 两个板块上，文章主要以官网作为呈现湖南省数字化博物馆发展的基本视点。湖南省数字化博物馆建设已经迈入了标准化建设发展的新进程，数字化博物馆基本框架的搭建已初具规模，官方网站对博物馆藏品有明确的一级、二分类，但是仍具有譬如信息立体化未建全、综合展示成果较少、交互性较弱等一系列问题。

（一）博物馆内部藏品信息收录与检索

博物馆、博物院基本上所有的展览都是依托在其藏品上的，其展览最初的策划与架构也并非是完全基于空中楼阁的想象，而是来源于策展人、策展部门对于藏品的了解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资源整合。藏品是展览创意产生的基本点，而展览创意是对藏品的再读和再生。因此展览策划的落脚点最终还是要要在藏品上，而关于藏品最

11月20日。

- 李艳峰：《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转型升级策略研究》，《今传媒》，2017年08月31日09:14。网址：<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831/c414067-29506558.html>。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0日。
- 《湖南省博物馆数字化与文物保护调查问卷[工作人员版]》，2019年。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应引起重视的部分则应是藏品信息的收录与检索。

在初期策划一个原创展览进行头脑风暴、确定展品范围时一定要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检索大量的藏品信息，而藏品信息的收录与其检索方式则是关系到这项工作是否能够进行、完成的程度和速度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现在湖南省博物馆藏品信息收录的工作属于藏品保管部管辖的范畴，而藏品部日常专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不包涵实习生在内）仅有一人，显然湖南省博物馆对于此处人员的分配是不足的。

藏品信息的收录基本全在一台置放在藏品管理部的电脑里，这无疑给藏品信息的检索带来了不便。进行藏品信息检索的人员除了进行藏品信息检索的人员除了需要办理审批手续之外，还必须到藏品管理部规定的设备上搜寻资料，而其设备从录入藏品之初就未曾更新换代过，可想其带给检索之人的不便程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藏品信息被收录在一些文献、图录资料之中，其中有一些资料因为出版年岁距今有一定距离而考古信息又在不断地更新，因而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这些纸质资料是无法囊括湖南省博物馆所有的藏品，大部分资料只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或是以前展出过的、正在展出的藏品进行展示，难以让策展小组、策展部门从新的角度出发来策划展览。

（二）博物馆展品信息的立体化处理程度

博物馆展品信息的立体化处理，通过对展品图像的数字 3D 建模的形式使展品图像能更清晰地展现展品实物内外、各个局部的细节⁵。文章从展品图像、展品内容注解、专题内容的涵盖三方面来综合评断。

一般情况下，博物院官网线上分类，被划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中的展品会有 1 张的展品图像的展示，只有 100-300 字的展品信息的基本的文字介绍，且一个展览只会挑选出 5-8 件展品做介绍，其它展览中的展品和博物院的库藏藏品没有以任何形式进行展现。针对这些展品的信息处理，可以先初步地像陕西历史博物馆一样让这些展品以 EXCEL 的形式展现，展示 1 张图像并

5 廖建国：《彝族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35(03),13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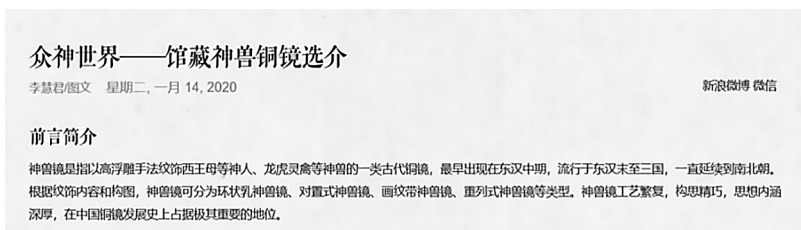
附有基本的展品名称和库存的信息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规划 1-3 张的展品图像的展示，以及基本的展品信息和 100-300 字的详解。对于“馆藏精品”，则是同“普通藏品”的线上展出形式大同小异，增加了对藏品基本展品信息的概述（如图 1），并增附有 300-500 字的详解。为辅助观众对于藏品的进一步理解，可以为展品进行专题内容的规划并撰写发布配图的短文解说。专题规划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更倾向于普通观者，会讲述一些与藏品有关的较为浅显的背景知识（如图 2）；另一类则更包含一些专业的知识，由博物馆内部相关研究人员撰写，总体上来说涵盖的内容更多，对其所面向的观众层次考虑得更充分（如图 3）。陕西历史博物馆则只规划了“每周一品”这一个版块，当然其所能覆盖的面也就相对较少一些。

图 1

名称：鎏金翼兽纹带五足铜炉台
 质地：铜鎏金
 时代：唐
 尺寸：口径37.3厘米，高11.5厘米。
 重量：6150克
 来源：1958年7月西安火车站广场出土

资料来源：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官网（截止 2020.10 为止）

图 2



资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网（截止 2020.10 为止）

图 3



资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网（截止 2020.10 为止）

二、湖南省博物馆的新媒体运营

博物馆的新媒体运营，指借助新媒体平台——以微博、微信、短视频、APP 和 H5 等新媒体为传播渠道，对博物馆价值和博物馆文化进行品牌宣传和公共关系。⁶ 在各类新媒体之中，微信公众号的应用在湖南省博物馆展览信息的传播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选用微信公众号作为新媒体平台的代表，对其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阐述。

（一）博物馆新媒体运营概况

总体上来讲，湖南省博物馆新媒体的影响力较小，以微博为例，湖南省官博仅有 37.1 万流量，平均一条微博的阅读量在 1 万左右，微博转发、评论、点赞数量绝大部分都没有超过 100。从博物馆自身品牌的打造和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两方面来分析，湖南省博物馆无如同故宫博物院那样鲜明的特色和风格，博物馆自身的品

6 曾耀农，徐脉沐：《基于营销视角的湖南省博物馆新媒体推广策略研究》，《未来传播》，2019, 26(04), 37-42。

牌形象还未真正树立起来；且其受众与湖南省博物馆微信号的互动量较少，也严重拉低了其传播力，影响了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针对其调研样本（2018年-2020年内的共92篇文章）内的全部文章，湖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都开设了留言功能，并在其中设置了“精选留言”的功能，但是约占比80%的文章没有完全开通这一功能，导致其发生的原因可能在于平台运营的工作人员对受众的不重视和留言指出过文章内容的问题。

（二）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服务功能

博物馆、博物院为进一步提升其社会服务的能力，建立了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来辅助实行这一职能。博物馆、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主要服务功能一般会被规划在其一级菜单中，主要有参观须知（包含开放时间、交通地理等内容）、参观预约讲解服务（包含展厅分布地图导航、导览器租赁等功能）、便民服务（包含餐饮休息、咨询服务等）三大板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需要继续完善博物院免费开放机制的情况下，在微信公众号开放门票预约的游客服务成为深化免费开放的必行之举。

湖南省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参观门票的官方预约通道均为其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分析其预约条目的醒目程度和方便程度来说，陕西历史博物馆更胜一筹。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预约服务显示在微信平台的一级菜单“我要预约”，而湖南省博物馆则显示在二级菜单“门票预约”、“活动预约”中。在预约方面，二者都能够在当门票或活动预约已满时给出类“今日预约已满”等的提示，且可以提前2天到3天的时间进行预约，为观展者制定游览计划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博物馆在疫情期间有序运营提供了保障，面对不同的用户需求提供多种预约购票方式的选择，但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涉及到第三方平台，比如说有可能需要跳转到美团等小程序、APP中才能最终完成购票的流程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有一定难度，可能需要在年轻人的帮助下才能顺利预约购票。

图 4：湖南省博物馆票务预约页面



（资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官微）

图 5：陕西历史博物馆票务预约页面



（资料来源：陕历博官微）（截止 2020.10 为止）

语音导览功能是另一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座率”最高的功能，其通过语音的方式讲解展品的相关信息，使用户在博物馆观看和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完全投入，以达到沉浸式体验的效果。湖南省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微信帐号都设置了语音导览这一功能，并将其放置在了二级菜单“参观服务”和“我要预约”之中。参观者只需要点击菜单中的导览选项，或者扫描藏品提供的二维码等其他信息，即可得到完整且准确的藏品解说⁷。在为参观者提供优质的讲解服务的同时，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工（人工讲解）和机器（讲解机器）的成本。湖南省博物馆立足社会使命，坚持以观众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多类社会教育形式与方法，在博物

7 陈伊歆：《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传播研究》，2019年。

馆社会教育实践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博物馆展览策展中数字化博物馆 与新媒体运营的发展趋势探讨

在博物馆展览策展中，数字化博物馆和新媒体运营已成为博物馆提升展览吸引力和观众参与度的重要手段之一。数字化博物馆可以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深入的文化体验，而新媒体则可以扩大博物馆的影响范围和提高观众参与度。

数字化博物馆和新媒体运营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向着与观众参与度、参观体验和互动性更加紧密相连的方向发展。这些新的展示手段和工具将为博物馆创造更加多样化、丰富化的展览形式，提升博物馆展览的吸引力和参与度，也将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一）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向

1、藏品简单数字化

这里所提及的“博物馆藏品的简单数字化”的概念不等同于所谓的“数字博物馆”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所囊括的工程中需要进行的一部分前期准备的工作，也就是先对传统介质的图像、文字和科学数据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简单的加工、保存和管理⁸。不同于对于博物院藏品的传统管理模式，对内进行藏品的简单数字化建设需要一套新的组织方式，可参考如下管理办法组织建设：

对于其网络交互平台的搭建，博物馆可以依托其信息网络部门对藏品数字化管理系统进行研发，在此基础上可以与博物馆建立良好往来的相关科技公司进行对接，帮助其攻克技术难题。藏品数字化管理平台的搭建位为其简单数字化提供了物质保障，而藏品信息采集才是其建设的坚实基础。根据藏品部提供的现有的藏品信息的电子存档进行进一步的信息更新和整理，并保证其收录资料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除此之外，博物馆员工针对展品展开的各项工作（举办临时展览等），也应被纳入藏品信息采集的工作之中。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智慧文博高峰论坛

8 杨向明：《数字博物馆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01): 93-96。

坛中谈到：“博物馆的所有员工既应该是数据资源的生产者、提供者，也应该是资源数据的使用者和管理者”⁹。关于博物院工作人员日常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工作人员登入内部网站或多用户联通系统即可查询博物馆藏品数据信息，可针对不同层级和部门的人员中设置登入权，获得直属上级（院长、部长、副部长）的审批即可获得准入资格。

针对在展览策划的传统团队中数据管理人员缺失的问题，且以目前的在职培训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数据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因此现下应暂时从信息网络部借调一部分工作人员完成该工作，待博物院秋招时招聘通信、电信、网络设备等专业毕业的数据管理工程师的工作人员接手。

博物馆藏品的简单数字化有利于减轻藏品保管部门进行藏品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陈列展览部门临时展览策划的前期工作的效率，有利于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写作，加快博物院信息一体化的进程，有助于达成国家文物局“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要求。

2. 数字化博物馆建设

除了对内进行藏品的简单数字化建设以外，在各省市倡导对外共享文化资源、共推文化建设的国内大环境下，建设以博物馆官网为依托的数字化博物馆，乃至智慧型博物馆是当今博物院信息系统转型升级的必要举措。

博物馆首先要做的是需要进一步推动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发展，在这些核心业务的推动基础上来进行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搭建好资源数据大平台，在资源数据大平台的基础上，做好对外的智慧服务系统和对内的智慧管理系统两大系统。在推进实体博物馆建设时，同步推进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最终建成一个可供游客完全潜入式操作、与实际所处场景位置相呼应的虚拟世界。数字化资源不再只是文字与图片，而是文字、图片、VR、H5等多种符号资源的综合展示，网站采用的是包含有后台数据库和应用程序的动态网

9 段晓明：《湖南省博物馆的智慧经验》，《龙华网直播文字》，2019年。
网址：https://www.sohu.com/a/338250014_120066051。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0日。

页，网站的交互性好。¹⁰

2019年移动通信开启了5G时代。5G技术也必然会在未来应用到博物馆信息化的领域之中，其中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是5G与博物馆联通的重中之重。包括湖南省博物馆在内的国内各大博物馆应当紧握技术发展的强力脉搏，乘借信息化、数字化东风，使博物馆的智慧化更上层楼，强化博物馆的服务能力、传播能力与影响力。这无疑会提升博物馆科技创新能力，为博物馆信息化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助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案。

大部分博物馆官网整体上是缺少与观众从展览中获取的信息交互的渠道，网站在前后两版中与观众只通过在二级菜单设置了“留言板”来进行信息交互。在解决展览本身与观众的交互的问题上，需要坚实的技术支撑，可以将新兴的5G技术应用到博物馆信息化的领域之中，乘借信息化、数字化的东风，使博物馆的智慧化更上层楼，不只是仅以图片、文字展示展品，更能以3D建模的方式让展品的信息实现一体化、多维化，让展品以更生动的形式面向观众。在针对与用户信息交互的机制的问题上，可以参考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官方网站的建设。让博物院能够为不同需求的人群提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大英博物馆的官网，能够在“Galleries”的选项中为观众提供大英博物馆内60个免费展厅的信息和地址，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用户浏览网站的个人倾向推送出更适合该用户的展览，并且提供导航地图和恰当的每个展厅游览时间的估算，方便观众制订自己的游览计划；而费城美术馆的官网则通过了解美术馆观众游览时间的差异化来制定不同的游览规划建议，如图6所示，如果观众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可以优先选择观看哪些展览（官方网站有提供日历，可以点击日历上的日期查看当日的展览）和哪里是适宜拍照的景点，并且建议他们可以将照片发在各种公共媒体上，让观众感受到来自美术馆的人文关怀的同时，让他们感觉好像美术馆为每一个观众量身定做游览美术馆的信息一样，还可以为博物馆带来私域或者公域流量，宣传塑造美术馆的品牌形象。

10 廖建国：《彝族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35(03), 131-13。

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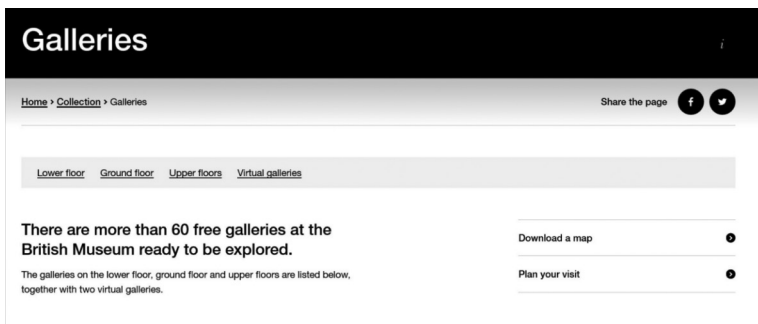
大英博物馆官网 (www.britishmuseum.org) gallery 页面截图
(截止 2020.10 为止)

图 6

If you only have a few hours



Go on a tour of the collection with folks in the know. Tours are offered daily and are free with admission. See the calendar for upcoming tours.



Head to the Great Stair Hall and get a selfie with our gilded beauty, *Diana*. Give us your best shot: share your visit on Facebook, Twitter, or Instagram and tag us @philamuseum.

资料来源：费城美术馆官网 (https://www.philamuseum.org) 主页面
(截止 2020.10 为止)

(二) 注重基础数据采集，部门之间共享与协同

技术专业团队只是一种对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的技术支撑，而数据才是基础。博物馆的所有员工既应该是数据资源的生产者、提供者，也应该是资源数据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把数据的采集利用和数据库的建设维护放到了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岗位的通用工作内容里面，并且将这些数据集合起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以便于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在此基础上，要提升全馆的协作共建意识，建立数据的长效采集机制。

（三）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运用与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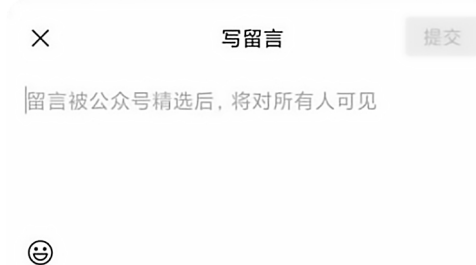
1. 在公众号消息会话与用户进行日常互动

博物馆可做以下改进：用户关注公众号以后，能够回复信息给用户，诸如“欢迎关注湖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点击以下链接可预约门票”等信息。用户的行为会触发事件推送，某些事件推送是支持公众号据此发送客服消息的；可以在一些特定指令下回复用户，如用户发“你好”，也可回“您好”；在需要对用户发送门票预约成功的通知时，博物馆公众号可以用特定内容模板，主动向用户发送消息。

2. 在文章、信息推送的过程中与用户进行互动

在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开设留言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开放“精选留言”的功能（如图7），且筛选尽量多符合文章内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精选留言；初步计划官方回复率要达到50%并，能够积极地对选出的留言进行回复，尤其要着眼于解决用户在留言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

图 7



资料来源：微信公号精选留言界面

图 8

另外，还有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李建中、蔡襄、范成大、陆游等一众如雷贯耳的中国古代书法大咖的作品都没展出来！

如果你想看，请在展厅出口的留言本上大声地“呼吁”一下：“烟云尽态”展还有续集没？

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微博上也留个言，说说你还期待欣赏哪些名家大咖的书法作品。谢谢大家的支持！

资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文章：“烟云尽态”啥意思？最接地气的官方解读来了！

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有奖调查问卷、有奖互动等方式，了解受众的喜好取向，以此吸引受众注意，促使受众产生反馈，为受众制造一些连接的机会。从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用户标签建设、精准推荐入手，和博物院观众做好朋友，进行每月不少于1次的针对用户评论反馈形成的文章、信息推送。

从“讲好故事、持续交互、深度解读、福利刺激”入手，让品牌人格化，让品牌自己说话，全面提升用户感知。

3. 打造博物院专属的沟通平台

利用微信公众号架设博物院自己的公众互动平台，如图9所示，湖南博物馆打造的“小论坛”平台，形式类似于微信朋友圈，但是非用户好友也可在图文内容下进行评论，帮助用户之间沟通展览、展品的相关信息，也便于博物院采集用户信息和用户反馈的展览信息。

图 9



资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小论坛”页面

（三）与不同种类媒体平台合作，丰富推广途径

在我国为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发挥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的大环境下，充分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深入对接网络创意成为了“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的重点实施内容之一，让博物馆、博物院能和动漫、游戏、影视及设计等领域融会交流，以扩展博物馆、博物院给类文化资源资源的社会服务功能，并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博物馆目前开展合作的媒体平台较少，且达不到临时展览需要的宣传效果。博物馆如果能够与不同种类的媒体平台合作，有可能会改善这一问题。例如，博物院可以和淘宝（如左图 10，陕西历史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所示）这类购物平台合作，为其文创产品开拓销路，与博物院品牌宣传、业务宣传相结合，体系化开展其服务宣传；或者是与“博物馆”这一形象相对贴近的知识类 APP 知乎、豆瓣这个纵类 APP 合作（如图 11，知乎与天津博物馆的合作所示，帮助打造智慧服务精品形象；也可以与电视台、视频平台

(哔哩哔哩等)达成合作,制作一些与博物馆相关的动画短片、纪录片等在播出(如图12,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卫视联动所示),能够结合博物院关键时点以及内部运营场景常态化的宣传,塑造博物馆的品牌与口碑。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市场的反应来选择推广的侧重方向,配合博物院观众年内满意度及关键感知测评。

图 10



资料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天猫旗舰店页面截图

图 11



资料来源：为知乎与天津博物馆的合作广告图；

图 12



资料来源为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卫视联动活动推文

结语

在国家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支持博物馆建设的大环境下¹¹，对博物馆应结合当前文化、社会建设的形式，从博物馆工作的陈列展览、公共教育推广等方面进行积极地思考与探索，结合2023年博物院发展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开展各项工作。

湖南省博物馆，在其展览艺术传播等方面，为建设开放多元的“大学校”作出了许多尝试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湖南省博物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与新媒体运营仍处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湖南省博物馆展览策划仍要在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与新媒体运营等领域要继续进行投入和创新。作者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线上、线下，对湖南省博物馆进行了充分的调研，通过多种调研、研究方法综述湖南省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建设与新媒体运营发展现状，并为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发展建议以及可展望的发展趋势，使湖南省博物馆能够在完善博物馆建设的基础上更好地顺应大众传媒时代的潮流。在博物院数字化建设上，对内进行藏品信息数字化，建立藏品收录与检索的数字化系统；对外建成具有藏品信息立体化、展览信息私人定制化的官方网站。在新媒体运营管理上，借助微信公众号平台通过多种互动机制与公众进行交互；对外与各类平台合作，创新推送内容，丰富推广途径。让湖南省博物馆以更生动、更具吸引力的模样面向大众，更多样地传播其博物院文化，同时也期望能够让望能够为我国博物馆行业的整体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11 《关于贯彻执行〈博物馆条例〉的实施意见》，2019年。网址：http://www.ncha.gov.cn/art/2015/3/20/art_1809_117717.html。取用日期：2020年10月11日。

参考文献

1. 陈伊歆:《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传播研究》,2019年。
2. 廖建国:《彝族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现状与发展研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35(03),131-13。
3. 杨向明:《数字博物馆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01):93-96。
4. 赵方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国内广告类期刊品牌传播策略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6年。
5. 曾耀农,徐脉沐:《基于营销视角的湖南省博物馆新媒体推广策略研究》,《未来传播》.2019,26(04),37-42。
6. 段晓明:《湖南省博物馆的智慧经验》,《龙华网直播文字》,2019年。网址:https://www.sohu.com/a/338250014_120066051。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0日。
7. 李艳峰:《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体的转型升级策略研究》,《今传媒》,2017年08月31日09:14。网址:<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831/c414067-29506558.html>。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0日。
8. 张静(编辑):《文物活起来 推进文物数字化展示》,《中国文化报》,2023年。网址:https://www.mct.gov.cn/preview/special/2023lh/9684/202303/t20230307_940283.htm。取用日期:2020年12月25日。
9. 《关于贯彻执行〈博物馆条例〉的实施意见》,2019年。网址:http://www.ncha.gov.cn/art/2015/3/20/art_1809_117717.html。取用日期:2020年10月11日。
10. 《湖南省博物馆数字化与文物保护调查问卷[工作人员版]》,2019年。取用日期:2020年11月28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来稿须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范围涵盖一切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学术领域不限。本刊已于 2014 年 10 月出版第 1 期，国内外公开发行。在此，本刊敬请作者投稿时注意如下事项：

1. 来稿要求选题新颖、论点明确、论据可靠、论证严密、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图表清晰。全文（包括图、表、参考文献和英文翻译等）篇幅不宜超出一万字。

2. 文稿顺序：篇名，作者署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英文篇名，英文摘要，英文关键词，英文作者简介，正文，参考文献和联系方式。

3. 篇名：简明、确切地概括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 20 字，必要时可以加副篇名。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英文篇名与中文篇名含义一致。

4. 作者简介：宜署真实姓名。多名作者的姓名之间用空格隔开。

5. 摘要：客观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不超过 300 字，不分段，不用图表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6. 关键词：反映论文的主题概念，一般标注 3-8 个，用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7. 作者介绍：姓名、职称、研究方向或者兴趣。英文：(Your Name) is a Professor / Associate Professor / Senior Lecturer / Research Associate at (faculty / school /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His / her) main research /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lease state your research interest). E-mail:

8. 正文：字体宜用宋体 12 号；正文内多于四行的引文请另外分段，且用楷体。

9. 注释：引文出处或用于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格式如下：

¹ 王扬宗：《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辽宁：辽宁教育，2002 年，第 262 页。

² 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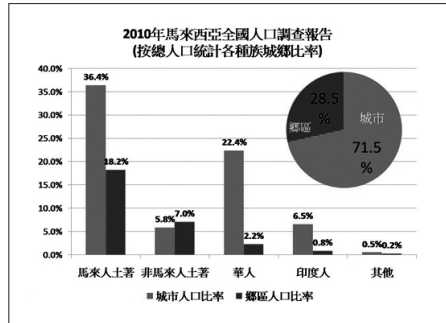
³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 年，第 9-19 页。

⁴ Vasil, R. K..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 1980, p. 21.

⁵ Charles Ros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7(1), 2015, pp.7-14.

10. 图表：文内所有的图表皆以序号标明及排列，如：图 1、图 2、表 1、表 2。序号后应备注该图表的相应标题（如有），资料来源置于图表的下方。如：

表 1 2010 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政府人口普查报告 / 作者制表

11. 参考文献：采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列于正文之后。如：

- 1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年。
- 2 江天骥：《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
- 3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年第111期。
- 4 Vasil, R. K.. *Ethnic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 1980.
- 5 Charles Ros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Vol.7(1), 2015.

12. 网络资料：作者：《资料名称》，《网站刊物名称》，资料发表日期。网址。取用日期，如：

- 1 张铁：《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2011年12月22日。网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677909.html>。取用日期：2017年5月13日。

2 Renae Merle, Simon Denyer. Global Markets Cap a Week of Turmoi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 2016. Websit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shares-rebound-on-government-support-but-rest-of-asia-unimpressed/2016/01/08/71fcb6d4-b582-11e5-8abc-d09392edc612_story.html. Accessed: May 21, 2023.

13. 联系方式：包括能够与作者及时沟通的通讯地址、电子信箱和电话。

14. 来稿一律采用中文简体。本刊提倡通过电子邮件投稿，并通过电子邮件与作者联系。请密切注意电子信箱，以免联系不畅，耽误时间。

15. 切勿一稿两投，违反者（包括所有署名作者）将在一定时段内被禁止在本刊发表论文。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作者踊跃投稿。

本刊编辑部电子信箱： ccs2014ics@gmail.com

地址：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i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西亚大学中唯一以中文为媒介，深度剖析当代中国学术刊物。

本刊自2014年出版以来，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尤其在海外华人学术圈中广受关注。本刊坚持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创新，并努力成为展示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窗口。

2021年8月，本刊正式收录于马来西亚高教部期刊索引库 MyJournal。

- ✉ 邮箱 : ccs2014ics@gmail.com
☎ 电话 : 603-7967 7288
📍 地址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 My Journal : <https://myjournal.mohe.gov.my/public/browse-journal-view.php?id=961>